

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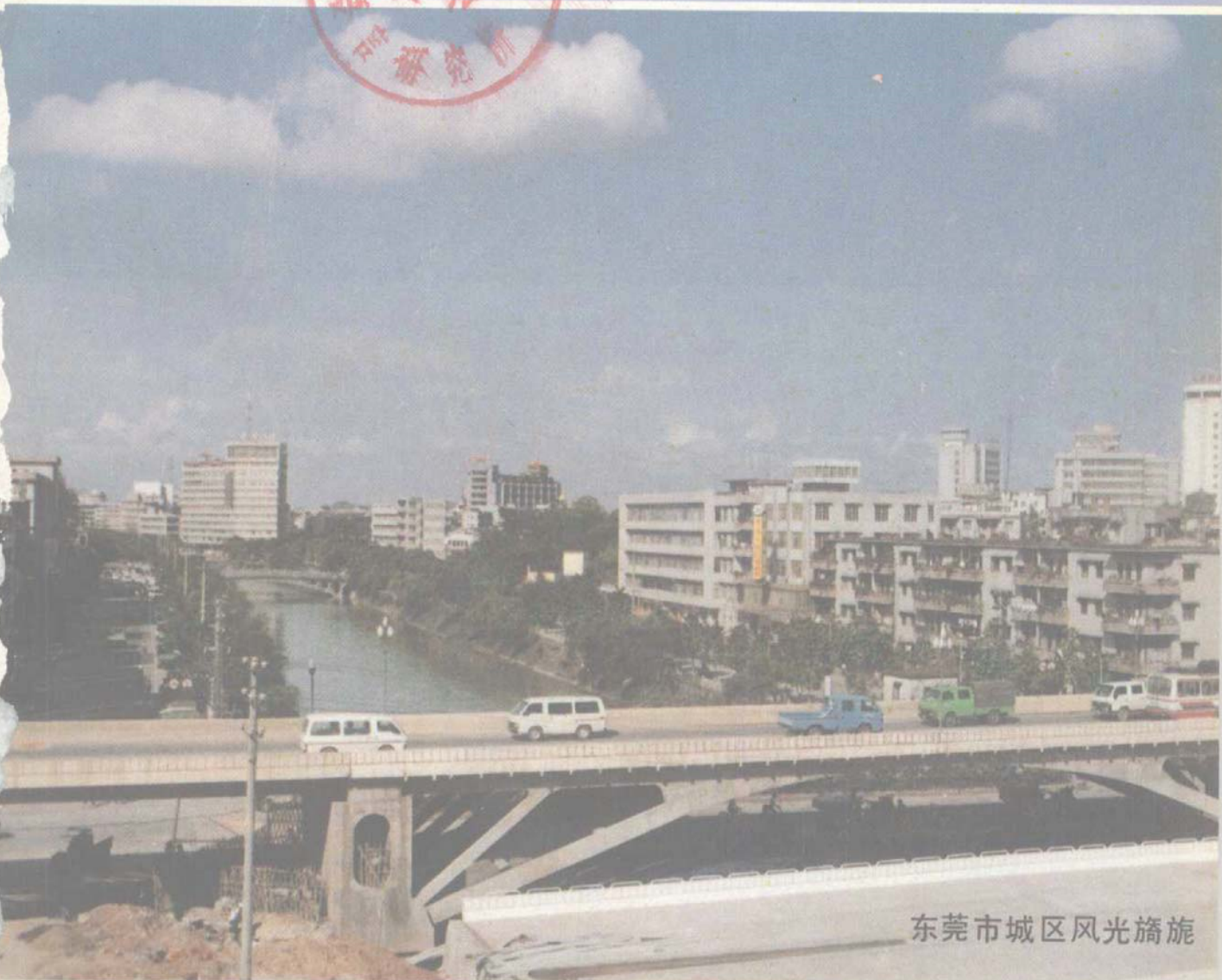
ISSN 1000-7320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1989

3

- 国家机构改革新思路
- 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
-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及其演变过程的开放性
- 超越“五四”新文化观



东莞市城区风光旖旎

ACADEMIC RESEARCH

东莞市莞城造纸厂

电话: 223816 电挂: 6644

厂址: 东莞市莞城运河东二路四号



该厂是广东省级先进企业, 设有多个网造纸机五台, 及先进的制浆系统, 主产各种规格的瓦楞厚纸、箱板纸和牛皮箱板纸, 质地坚实, 耐破度强, 外形美观, 成箱质量高。

东莞市莞城塑料厂



该厂拥有从国外引进的各种注塑机、吹塑机、印刷机、自动封口机等百多台先进设备, 主要产品有高、低压薄膜、农用薄膜、塑料手套、彩印胶袋、各种工程塑料制品及彩色印花儿童凳等。

电话: 221072 电挂: 5229

厂址: 东莞市莞城镇新沙坊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州 市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 : BN268 北 京 2820 信 箱

代 号 : 46-64 国 内 定 价 : 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书 号 : 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穗 工 商 广 字 207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89年第三期 (总第九四期) 目录

教 育

广东经济发展战略与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高德鸿 (6)

经 济

略论产业政策在治理整顿中的作用和问题 廖建祥 (11)

试述产业政策设计 聂周荣 (15)

1516—1987: 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 辛 丁 (21)

在综合配套改革中根治通货膨胀 王燕平 (27)

哲 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及其演变过程的开放性 李恒瑞 (31)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 张江明 (35)

系统哲学是东西方哲学统一的基础吗?

——“依·拉兹洛教授一席谈”之商榷 乐志强 (41)

五四运动70年

超越“五四”新文化观 桑 兵 (45)

——本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五四·新儒学·人的现代化 单世联 (50)

文 史

唯真诚可以永恒

——聘如新作《永恒》序 峻 青 (55)

刘勰自然观试论

——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 曹础基 (58)

稿件主审编发 张硕城 责任编辑 黄荣显 封面设计 陈沛林

- 谈敦煌石窟中的诃尼沙 (Ganesa) (香港) 饶宗颐 (62)
秦汉岭南经济述评 冼剑民 (65)
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 陈伟明 (68)

学 者 议 政

- 谈政务的公开与监督 吴志亢 梁学忠 (72)

学 术 报 导

- 广东保险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侧记 郑英隆 雷比璐 (75)
全国首次张九龄学术研讨会在韶关召开 黄志辉 王锦非 李彩彬 (77)
珠海市“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侧记 林有能 (78)

企 业 之 窗

神州人的科学精神

- 顺德神州燃气具联合实业公司调查系列之一 梁 风 (80)

书 海 酌 蠡

- 子贡“文犹质、质犹文”说商兑 (周凤章·57) 王棊籍贯辨正
(熊清元·26) 僧叡生卒年考 (斯翰·49) “处处煮茶藤
一枝”解 (陈永正·76) 李端《闺情》误解疏理 (熊飞·79)

CONTENTS

-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and the ways
Bettering the Provincial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Gao Dehong (8)
- A Cursory Discussin on the Roles and Problems of Industrial Poli-
cy in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and Rectifying
..... Liao Jianxiang (11)
-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Designing of Industrial Policy
..... Nie Zhourong (15)
- 1918—1987: Four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Xin Ding (21)
- Overcome inflation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Matching Reforms
.....Wang Yanping (27)
- The Openess of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and Its Process of Dev-
elopment..... Li Hengrui (31)
-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Socialism
.....Zhang Jiangming (35)
- Is Systematic Philosophy the Foundation of Unifying Philosophy of
the East and West Together?—Reviewing on Prof. E. Lazlo's talk
..... Ruo Zhiqiang (41)
- Surmount the New Cultural Respective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Limits and Break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in 20th
CenturySang Bing (45)
- The May 4th Movement, New Confucianism, Man's Modernization
.....Shan Shilian (50)
- Only Sincerity could be Immortal—A Preface for Pin Ru's New
Poetry named The Immortal.....Jun Qing (55)
-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Liu Xie's Viewpoint of Nature—A comp-

- arative study with that of Zhuang Zhi'sChao Chuji (58)
-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Ganesa in the Rock Holes of Dun Huang
 (Hong Kong) Rao Zongyi (62)
- On the Ling Nan Economy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Xian Jianmin (65)
- Studies on the Changes of Traffic Routes in Ling Nan District in
 Song Dynasty.....Chen Weiming (68)
- On the Openess and Monitoring of Political Service
Wu Zhikang & Liang Xuezhong (72)
- Reports from the Seminar on th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Insurance Industry..... Zheng Yinglong & Lei Bilu (75)
- The First 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oet Zhang Jiuling was held
 in Shaoguan..... Huang Zhihui & Wang Difei & Li Caibin (77)
- Repor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Mr. Tang Shaoyi in Zhuhai City
Lin Youneng (78)
-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Shen Zhou People——an investigation of
 Shen Zhou Gas Stove Corporation of Shun De County
Liang Feng (80)

广东经济发展战略

与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高德鸿

8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第二次产业结构大调整以及世界经济中心正向太平洋移动的趋势,要求处于沿海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率先在世界经济大转移中扮演角色。广东的基本经济战略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国内市场为依托,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三角洲开放区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把传统产业部门让出来,以第一、第二产业为基础,重点发展第三产业,采取“贸—工—农”的方针,把外经、外贸发展作为主要导向性产业;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商品,打入国际市场。

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广东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是否适应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结构是否合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结构决定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尤其是在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显得特别重要。

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衡量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从结果来衡量,高等教育的产出是否推动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二,从过程来衡量,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机制是否健全。目前,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主要有两种机制,一种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杠杆的调节,另一种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国家计划控制。有计划按比例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就必须对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人才的规格、数量作出准确的预测,同时,还必须具有灵活的政策保证高等教育结构能够自我调整,诸如,在指令性计划外的指导性计划招生、自费生,地方、部门以及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正规高等教育的补充等。

一、高等教育地区结构要适应广东改革开放的梯度格局

高等教育地区结构是指高等教育机构在地区分布上的构成状态。

广东省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已初步形成了以深圳、汕头、珠海三个经济特区为前沿,广州、湛江二个开放城市为中心,珠江三角洲为辐射面的梯度格局。从1988年开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从“小三角”扩大到“大三角”,另外又开辟了以汕头市为中心的韩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以湛江市为中心的鉴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呈现出多层次、多方位、全面开放的格局。广东高等教育地区结构应该主动适应这种开放的梯度格局。

目前广东拥有46个高等教育机构(不包括海南),汕头、深圳两个特区各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各市几乎都有一所师专或职业大学,其余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都集中在广州。从地区分布来看,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而以湛江为中心的鉴江三角洲只有2所农业院校,1所医药院校,尚无综合性大学或师范院校,这个地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师范教育和工科人才都需要依靠其他地区、市来培养。应该看到,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不仅能优先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输送人才,而且与该地区的繁荣稳定,扩大该地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防止人才流失有着紧密的联系。湛江是广东西部沿海开放的重要城市,面向海南,工业发展很有潜力,它的高等教育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经济开放的层次以及现有的高等教育基础不同,各地区在今后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上应有所侧重。首先,特区大学的办学模式应面向特区,在招生、分配、管理体制、教育经费的来源

等方面都应该更开放灵活。特区是参加国际分工的最前沿阵地,在国际竞争中,产业结构调整频繁,其相应的人材需求要求特区大学在教学计划、专业结构、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

广东省高等教育分布状况

(表1)

| 地区类型 | 广州 | 湛江 | 佛山 | 韶关 | 茂名 | 梅县 | 肇庆 | 惠州 | 潮州 | 江门 | 中山 | 汕头 | 深圳 | 合计 |
|------|----|----|----|----|----|----|----|----|----|----|----|----|----|----|
| 综合大学 | 2 | | | | | | | | | 1 | | 1 | 1 | 5 |
| 理工大学 | 5 | | | | 1 | | | | | | | | | 6 |
| 农业院校 | 2 | 2 | 1 | | | | | | | | | | | 5 |
| 医药 | 4 | 1 | | | | | | | | | | | | 5 |
| 师范 | 3 | | 1 | 1 | 1 | 1 | 1 | 1 | 1 | | 1 | | 1 | 12 |
| 语言 | 1 | | | | | | | | | | | | | 1 |
| 财经 | 3 | | | | | | | | | | | | | 3 |
| 体育 | 1 | | | | | | | | | | | | | 1 |
| 艺术 | 2 | | | | | | | | | | | | | 2 |
| 民族 | 1 | | | | | | | | | | | | | 1 |
| 短大 | 1 | | 1 | 1 | | 1 | 1 | | | | | | | 5 |
| 总计 | 25 | 3 | 2 | 2 | 2 | 2 | 2 | 1 | 1 | 1 | 1 | 1 | 2 | 46 |

更大的可塑性。为了加强特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特区大学必须主动与企业横向联合,开发高科技产品,形成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特区大学不仅仅是特区经济文化繁荣的保证,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基地,它要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经验。

其次,广东的文化、经济中心广州,已形成了门类齐全、宝塔形多级结构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功能、多方位的。它既要充当学术中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性科学研究,同时又要充当全省人才培养、调配中心,健全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在宝塔形多级结构基础上办出一流大学是今后广州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广州高等院校门类齐全、校址集中,形成“大学城”、“科学园”有极有利的条件,广州应该努力办成几个中心:(1)华南信息情报中心。广州地处祖国南大门,交通方便,通讯设施有一定基础,可以广泛收集世界

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教育信息,为各地提供信息咨询服。(2)教育培训中心。结合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转移的特点,为广东省培养、训练外向型经济人才,为企业的管理人才提供更新知识结构、终生教育的场所。(3)科技研究与开发中心。以基础科学研究为辅,应用性科学研究为主,发展与企业的横向联合,开发高科技产品,衍生新兴产业,为广东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作准备。

其他的市、地区要以师范教育和职业大学为发展重点。师范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经济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不仅仅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而且是全民素质的竞争。师范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最基础的环节,也是经济起飞的根本。职业大学费用低廉、形式灵活,它可以根据本市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自身的科类结构、办学模式进行调节,使职业大学与本市的经济的发展更加合拍。一般说来,这些职业大

学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 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教育要求，扩大高等教育机会。(2) 浓厚的职业色彩。职业大学应该给予受教育者一技之长。随着人事制度、录用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市场的重心将偏向于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受过专门职业训练的实际工作者、技术人员，尤其是广东地区新近崛起的乡镇企业、“三来一补”企业需要相当数量这种类型的人才。(3) 为企业培训在职人员，这是职业大学寻求产业与教学合作的一个方向。

二、高等教育的水平结构要适应广东经济改革对人才规格的要求

高等教育水平结构是指由不同规格、程度的

培养目标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构成状态。

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结构分为三级，依次为专科、本科、研究生（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分别为教育的第五、六、七级），各级之间的比例失调一直存在，尤其是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的比例失调特别严重，造成了长期的经费和人力的大量浪费。在纠正这种比例失调的过程中，广东省作了大量的工作，使专科与本科招生比例从1982年的1:2.5转变成1987年的1.2:1。

但从表2来看，广东省高等教育第三级人数占在校人数的5%左右，第一级人数占50%左右，这二级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所占比例仍然偏低。根据国内外专家对人才配套的研究和预测，研究生（包括博士和硕士）、本科生、专科生在

广东省高等教育水平结构现状

(表2)

| 时 间 | 博 士 生 | | 硕 士 生 | | 本 科 生 | | 专 科 生 | |
|--------|-------|-------|-------|-------|-------|-------|-------|-------|
| | 人 数 | 比 重 % | 人 数 | 比 重 % | 人 数 | 比 重 % | 人 数 | 比 重 % |
| 1984年 | 12 | 0.05 | 788 | 3.55 | 12347 | 55.67 | 9054 | 40.78 |
| 1985年 | 73 | 0.25 | 1466 | 5.02 | 13337 | 45.66 | 14333 | 49.07 |
| 1986年 | 32 | 0.11 | 1483 | 5.03 | 13426 | 45.58 | 14519 | 49.28 |
| 1987年 | 92 | 0.28 | 1416 | 4.49 | 14265 | 44.28 | 16446 | 51.05 |

总体上的比例应保持在1:3:9。各级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第一级高等教育投资少、收效快，所以，目前许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少于500美元的国家，第一级高等教育在校生都占绝大多数。第一级高等教育期限短、学业专的特点非常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广东乡镇企业、“三来一补”企业的崛起，正需要大批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发展专科教育，必须在进行基础知识、基础理论教育的同时，加强实践环节和实际工作能力的训练，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突出适应广东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使专科人才更加实用和适应广东经济发展的需要。

广东的第三级高等教育也有待于改革。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广东平均每年从省外高校引进逾千人的第三级高等教育人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对这个层次的人才的需求仍处于未饱和状态。然而，目前广东省第三级高

等教育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和质量大面积下降，硕士生、博士生不安心学习。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首先来自于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其次，问题来自于第三级高等教育内部，我国长期以来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都是以“学者型”、“研究型”为主，接纳第三级高等教育人才的地方不是科研机构就是高校，而这些机构都面临饱和，把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输送到企业，往往“不适用”。目前广东劳动力市场紧缺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熟练的外语、精通国际法，能与外商直接谈判的外经、外贸人才都应该由第三级高等教育输送。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必须杜绝因人设点、因人招生的不合理现象，否则，不仅国家经费大量浪费，而且高等教育无法经受新的挑战。

各级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培养目标和规格的不同，应具体反映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上，不能把专科当作本科的年限上的“缩

减”，本科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过渡，各个层次都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各级教育都应该产出“成品”，而不是“半成品”。

三、高等教育科类结构要适应广东商品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

高等教育科类结构是指不同学科领域的高等教育构成状态。

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在50年代初成型，到目前为止，分为工科、农科、林科、医药、师范、文科、理科、财经、政法、体育、艺术11大类，在这些科类中设置具体专业。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按系设专业，按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当时学习苏联经验，以培养“窄”口径专业人才适应计划经济为主要方向，专业越划越细，而且，又由于“重理轻文”观念的影响，在增加理、工比重的同时，减少财经、政法专业，致使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畸形发展。自1979年以来，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导下，这种不合理现

象才逐渐扭转过来。广东省基本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近年来，广东在调整高等教育科类结构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重点发展了外语、财经、管理、法学、计算机、电子、建筑及应用文科等专业，同时改造传统专业，扩大专业口径，加强专业的应用性、适用性，使广东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的调整走上较为合理的轨道。

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高等教育科类比重变化的重要杠杆。广东经济发展战略以“贸——工——农”的次序为方针，重点发展外经、外贸、交通运输、金融、旅游等第三产业，这种外向型经济战略需要大批有国际眼光的经济管理、通商贸易、会计审计、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外向型人才，广东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必须主动适应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广东虽然对专业结构作了一些调整，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理、工为主的专业结构，财经、政法、管理的比重仍然偏低。广东在专业调整过程中面临着传统专业如何转轨以及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专业如何设置的问题，专业综

广东省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现状

(表3)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
| | 招生人数 | 比重% | 招生人数 | 比重% | 招生人数 | 比重% | 招生人数 | 比重% |
| 总计 | 21401 | 100 | 27670 | 100 | 27945 | 100 | 30711 | 100 |
| 工科 | 3889 | 18.2 | 5180 | 18.7 | 5552 | 19.7 | 6772 | 22.1 |
| 农科 | 2012 | 9.4 | 1823 | 6.6 | 1614 | 5.8 | 2171 | 7.1 |
| 林科 | 61 | 0.3 | 92 | 0.3 | 50 | 0.2 | 126 | 0.4 |
| 医药 | 2027 | 9.5 | 2186 | 7.9 | 2154 | 7.7 | 2400 | 7.8 |
| 师范 | 5888 | 27.3 | 7699 | 27.8 | 9723 | 34.8 | 10060 | 32.8 |
| 文科 | 3231 | 15.1 | 4109 | 14.9 | 2528 | 9.0 | 2466 | 8.0 |
| 理科 | 1636 | 7.6 | 2091 | 7.5 | 1998 | 7.1 | 1676 | 5.5 |
| 政法 | 550 | 2.6 | 439 | 1.6 | 463 | 1.7 | 362 | 1.2 |
| 财经 | 1,744 | 8.1 | 3500 | 12.7 | 3409 | 12.2 | 4126 | 13.4 |
| 体育 | 281 | 1.3 | 385 | 1.4 | 248 | 0.9 | 254 | 0.8 |
| 艺术 | 142 | 0.6 | 174 | 0.6 | 206 | 0.7 | 298 | 1.0 |

合化是今后广东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首先,这是广东近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变化的新要求。广东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最大的特点便是机动灵活,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因而,它们最需要的便是能够从一种技术职业转向另一种技术职业的专业人员,需要既懂专业技术又懂管理的多面手。其次,专业综合化是现代科学发展对高等教育专业改革提出的要求。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再向人文、社会科学靠拢,形成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化,专业随学科的分化衍生而划分过细的作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实际上,专业综合化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日本的筑波大

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77年建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教学中心”都是专业综合化的产物,苏联也改变了过去培养狭窄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方向,转而以培养多专多能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今后高等教育的主流。专业综合化的宗旨是拓展人才的职业适用性。专业综合化最终要求课程综合化,文、理、工相互渗透,建立一种新型的知识体系,使课程内容在最大程度满足专业训练的同时,保证人才有高度的职业适应能力。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略论产业政策在治理整顿中的作用和问题

廖建祥

国务院于今年3月18日公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个《决定》把产业政策作为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措施。本文拟就当前整治经济所面对的严峻经济问题的性质和产业政策的实施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

当前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暴露了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消费基金膨胀，突出显示在财政支出膨胀和信贷膨胀上，这又是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的直接原因。产业结构上出现的加工工业的长线太长，基础产业的短线太短，能源、交通、原材料短缺成为突出矛盾，是同投资结构不合理、同投资政策的偏差分不开的。目前存在的产业结构畸形以及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矛盾，市场紧俏商品的短缺和劣质滞销产品积压同时并存的现象，不也是在国家财政、信贷和计划的实施偏离了正确的产业政策造成的吗？由此说明，当前的需求过旺和有效供给不足，是国家没有正确的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因而出现宏观政策和措施的自流，招致经济

的严重失衡。

从去年九月中央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以来，半年来的治理整顿着重于从紧缩上做文章，采取惯用的行政手段“一刀切”的手法。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还没有出台，紧缩信贷的“一刀切”急刹车，使那些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优势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首当其冲挨了“刀切”，难于获得流动资金贷款，资金周转不灵，再生产和流通陷于困境。而那些产品滞销积压的低效益劣势企业反而不受冲击。紧缩大大影响了生产适销对路商品的企业，影响了出口创汇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了整个市场有效供给的增加。实践证明，这样减速降温带来生产的滑坡、外贸出口的滑坡，显露出经济停滞萎缩的趋势。

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方针的贯彻，是“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加强宏观控制，指导市场发育，协调各方面行动，逐步缓解总需求与总供给、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要求压缩和控制长线产品的生产和建设，增加和扩大短线产品的生产和建设。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这些

原则，是完全符合于扭转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畸形的实际状况的。

对当前经济过热、需求过旺以及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问题，我认为需要有正确的理解。需求过旺超过供给，应该压缩社会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需求与供给是辩证的统一，需求过大同时反映了供给的不足。因此，压缩社会需求要同增加社会供给结合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促进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否则，如果只着眼于压缩社会需求，而社会有效供给不能较多地增加，那就难免出现滞胀、经济萎缩。因此，从产业政策的实施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来看，压缩控制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两者不能偏颇，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当前出现的一味强调压缩社会需求进行的紧缩做法，实在令人焦虑，有必要从产业政策的原则和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早改进。

（二）

从我国当前治理整顿时期的产业政策，触发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产业政策的反思。建国后四十年，从经济恢复时期到1956年“一五”计划完成，奠定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这个时期的农轻重比例是比较协调的，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其后经过“大跃进”，由于“共产风”、瞎指挥、高指标的一系列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62—1965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在产业政策上强调农轻重方针，使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协调，到1966年国民经济已经转到向上

发展的轨道。但随之又受到“文革”十年的浩劫，“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和破坏，陷于崩溃边缘。几经折腾，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使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十年来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都起了重大的变化，使现代化建设大大向前推进。但当前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又是如此严峻。那么，从过去历程的反思中又得到什么启迪呢？我认为有几点是很引人深思的：

其一、关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的失衡和协调。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依据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以及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错误，以致重工业钢铁和机械工业的发展离开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形成跛行状态。产量多而质量差，经济效益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市场供求上长期处于消费品短缺的卖方市场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有力地扭转了长期以来“重重、轻轻、轻农”的做法，使消费品短缺的现象有很大改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农轻重比例也趋于协调。但由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交替时期，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机制未能及时形成，因而又出现加工产业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的现象，与基础产业不相适应。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加工产业发展过快，长线太长。这同过去情况有所不同。这次治理整顿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如能充分贯彻《决

定》，实现结构调整，达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基本平衡，对今后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将会有重大作用。

其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国家财力物力，这也是很长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多次调整，又多次重复，始终未摆脱恶性循环的困扰。这除了用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饥饿症”来解释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没有能建立总量控制和投资结构的科学的调节机制，这是经济建设上长期的难点。在当前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加上消费基金膨胀，则既有“投资饥饿症”又有低报酬的还帐及“消费早熟”等复杂因素凑在一起。因此，通过治理整顿如果能以产业政策作依据，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又能增加有效供给；压缩一般加工产业，又能重点支持基础产业和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支持效益高的优势产业，淘汰效益差无前途的劣势产业，那将会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

其三、在当前治理整顿中，我们在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解决资金、原材料以及发展基础产业等方面，都可能通过利用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两头在外”企业，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缓解“瓶颈”的阻障。这是比以往的调整和整顿具有的十分有利条件。

其四、基建规模过大，财政收不抵支形成赤字，靠增发钞票解决，以致通货膨胀、物价上升，这是多次出现而又多次实行调整整顿的重大问题。当前回笼货币和加强货币管理仍然是遏制通货膨胀和抑止物价猛涨的最关重要的措施之一。此外，有计划地推行股份化和发展股份经济，对

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增加有效供给，抑制通货膨胀，都会有良好作用。

(三)

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重点是要解决经济过热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也为今后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创造条件。当前的产业政策是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密切结合的，从长远看产业政策是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看，产业政策的实施有以下几个难点：

其一、根据产业政策的发展序列和目录，对全国两千万个企业（其中中国企业几十万）实行区别对待，扶优汰劣，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极为复杂的问题。现有企业数量最多的是加工产业，正是目前长线太长需要缩减的对象。而要按照产业序列的纷繁目录，确定哪些应予保持，哪些应淘汰，就不容易了。由于每种企业和产品，既是在不同的经济形式（所有制或产权）下进行生产，其生产要素组合条件和产品品种也多种多样。如果从经济效益来区分，除明显的亏损或“死火”企业显然要淘汰外，一般的产业就不易减缩了。至于地方政府对所属的企业，为保持其利益往往不愿压缩淘汰。因此对压缩加工产业的长线就成为一个难点。

其二、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产业政策的实施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效应会大些，特别是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国家计划和物资部门手上、依靠国家部门调拨供应的企业会有较明显的制约力。而对于集体所有制以及个体和私营企业，它们不依靠国家计划分配物资和银行贷款，那么

产业政策的作用就很小或不起作用。我国的集体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个体和私营企业也在发展。因此要全面贯彻产业政策就成为难题。

其三、财政、金融部门的任务与产业政策的矛盾，又是产业政策贯彻的难点。加工工业的发展是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压缩加工产业和扩大基础产业，势将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加财政支出，这在地方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条件下，是一个难题。银行信贷也有类似情况。加工企业周转快，还贷容易，有利于银行信贷资金的周转和利润任务的完成。对重点支持的产业采取优惠（如中行规定对外向型企业贷款利息九厘，低于定期存款利息造成信贷障碍），难以兑现。何况目前专业银行尚未摆脱政府部门“长官意志”的干预，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

其四、条条领导和垂直业务指挥在财经部门仍居于支配地位，各部门从本身任务和利益出发，所定的各种措施，在与产业政策相矛盾时，产业政策就会被搁置或变形，以致使产业政策的目标落空。

其五、全局与区域关系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差异很大，在改革开

放中产业政策的推行会有全局和局部利益的差别和矛盾问题。由于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加上政策的倾斜使广东和沿海开放地带经济发展较快，与内地和省区间的矛盾也显露出来。如何促进省、区的横向经济联合，互利互惠，使全局与区域间的关系保持协调，避免区域封锁影响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商品、资金、劳力、信息、物资顺利流通，以利于产业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

其六、治理整顿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关系到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分配问题，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会碰到许多的困难。要使治理整顿和产业政策顺利实施，只有以改革为动力，把经济改革和有步骤的政治体制改革结合，推进政治民主化，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发挥广大群众的当家作主精神，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就。没有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提高政策实施的透明度，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现代化是难于实现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试述产业政策设计

聂周荣

所谓产业政策，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由产业组织、市场、资金、技术和计划调控等诸政策与之相适应的、共同构成的综合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有效和优化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高效益增长。

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因由在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即使在我国社会总需求大大多于社会总供给的情势下，也不能忽视它。控制社会总需求采取压缩投资、信贷等一些总量调节的办法对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虽然很有必要，但从中长期看，问题的根本解决还要靠以结构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因为没有结构性政策，总量控制就往往只能在“收”与“放”、“膨胀”与“萎缩”两极之间作极端的选择。例如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通盘考虑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轻重缓急而“一刀切”，其结果不仅无助于总量平衡，而且还会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在“切一刀”中坐失调整的良机。所以，制定以结构导向的产业政策，意义十分重大。

一、产业结构的政策设计

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其主要任务是选择战略产业（或主导产业群），设计可以协调运转的产业整体

结构，适时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如何在众多产业群中确立战略产业或主导产业群？国际上对此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他不满足于克拉克定理和霍夫曼定理关于产业动态的描述，提出了“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和“关联效应基准”等选择战略产业的准则。

“收入弹性基准”：经济学把需求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关系，称为需求收入弹性（简称收入弹性）。以 L_m 代表收入弹性， m 和 Q 分别代表收入和需求量，则需求收入弹性的公式为： $L_m = \Delta Q/Q / \Delta M/M$ 。不同的产业的收入弹性是不同的。不同的收入弹性表明不同产业潜在的市场容量，只有收入弹性高的产业才有可能不断扩大它在市场上的份额，而这种产业往往代表着结构变动的方向。换句话说，高收入弹性是战略产业的必须具备条件。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这个基准的前提是各个产业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速度的不同，生产率上升率高，即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由于成本下降也快，就能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向这样的产业优先配置资源，就可以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符合这一条件的产业可

作为战略产业来考虑。

“关联效应基准”：这个基准的前提是看关联效应的大小。所谓“关联效应”，是指某一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产业投入产出水平影响；关联效应是双向的。具体衡量某一产业关联效应大小的指标有：后向连锁度，即一个产业所使用的由其他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与该产业产出的比重；前向连锁度，即一个产业向其他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占该产业需求的比重。前后向连锁度大的产业，则能有力的诱发其他产业扩张，可作战略产业来考虑。

上述几个基准对举世公认成功的日本产业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固然值得我们借鉴。但这几个基准毕竟只强调了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产业带动能力，而且它们难以精确计算，所以，考虑战略产业或主导产业群时，还应结合具体情况，弄清一定时空上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比如还要考虑自然资源、能源、就业压力等因素，将各种因素统筹考虑、综合判断。

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政策在选择战略产业后，还应对余下的众多产业制订相应的发展政策，以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协调运转。当然，这些产业的政策可以粗线条些，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产业结构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动。对此，世界上不乏著名论述，如认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以下时期(1958年美元，下同)，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缓慢上升；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时期，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二产业内

部的变动，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300美元时期，基本上是轻纺工业化；在300~1000美元时期，开始重工业化；1000美元以后，则开始高加工度化。所以，考虑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还必须预见到未来的发展变化，保证在整体发展水平进入新阶段时，产业结构能够顺利高度化，转换成更高的发展形式。

二、产业组织的政策设计

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是企业组织政策。企业组织政策是产业结构政策的重要保证，只有企业组织有创造能力、竞争能力、开发能力、积累扩张能力，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才有活力。企业组织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针对企业的高耗、低效、分散等问题，通过一系列重组活动，实行规模经济、规模经营。

所谓“规模经济”，就是随生产能力的扩大，使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平均费用下降的趋势。当然，规模扩大带来的“经济”并不是无限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如再扩大规模，规模经济就不再出现，而且不伴随技术、工艺上的进步，不伴随分工、协作和“三化”（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的进展，单有批量的扩大，规模经济是得不到的。因此，规模经济因技术的进步而发展。此外，“规模经济”还指生产同种产品的若干生产线（或工厂），或者处于生产工艺过程的不同水平的若干生产线（或工厂）联合在一个经济实体（企业）中形成的经营规模的扩张，及由此所带来的比分散经营更高的效益，这也称为“企业规模经济”。

重组企业规模经济、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式有：

1. 搞好专业化协作。这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基础工艺要按专业化、协作和工厂经济规模组织生产；二是大力开展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工作，加强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

2. 按经济规模对企业进行改造。高度分散的小企业与高度集中的大企业之间形成的分工协作网络，是发达国家产业组织的典型特征。我们也应当尊重产品生产及其工艺的自身规律，分门别类改组、改造那些不应分散的、小型化的或不应高度集中的、大批量生产的企业。该分散的、小型的保留之。该集中的、大批量的则坚决集中、大批量生产。政府决策部门更应着眼后者。

3. 组织联合企业。按产品原则、工艺原则或原材料加工顺序原则，或以拳头产品为龙头，将包括科研、生产、销售、出口的若干企业组合在一起，形成紧密型或松散型的企业集团，实现生产、科研、外贸、供销、服务一体化。

三、产业产权的政策设计

产业产权政策设计的重要意义在于催生成千上万的发展主体，并使它们在竞争、发展过程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产权的实质是企业的所有制。当今世界比较流行的产业产权政策的目标是建立公私混合、多种形式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

公私混合、多种形式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的产业产权结构有如下特征：1. 公有制与私有制（包括外国私人资本）不是你消灭我、我消灭你的完全对立关系，而是长期并存、互补长短、互相促进的协调发展的关系；2. 具有开放性，公中有私，

私中有公，相互渗透，公私混合，形成非公非私，亦公亦私，公私统一格局；3. 主要组织形式是股分所有制，社会上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各种团体，所有家庭和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购买股票。

在我国产业产权政策模式将表现为：以国营经济为主导，股份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公私混合经济长期并存，协调发展。

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就是在其他各种形式大发展的基础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但非竞争性的公共设施等基础产业及大型骨干企业，仍由其从事经营，使其由现在的主体作用变成主导作用。

以股份制为主体，就是要大力发展股份经济，尤其要大力发展国家、企业、职工共有的股份制经济，使其成为新型的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

长期并存、协调发展就是让组成社会系统的各级政府、各类大中小企业、各种社会团体、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资产所有者，并以平等的地位存在、竞争和发展。

四、产业市场的政策设计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经济的运行要靠市场机制，各种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当然要靠市场机制。所以，产业市场政策是产业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全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模式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产业市场政策设计的重要指导思想。建立国内外立体开放型经济体系，保证企业可以充分地、平等地竞争，各种生产要素可在产业间有序流动的产业市场，从而强化各产

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向国内外立体开放，就是既允许国内投资者，又允许国外投资者兴办各种法规允许发展的各种产业；对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对关键加工序列或深加工序列的企业给予优惠。

保证企业可以充分地平等地竞争，是产业市场政策的长期任务。只有竞争，才能迫使企业不断地思考什么是最佳的生产方法，哪里是最有利的销售市场，什么样的产品最具有销售机会，等等。所以，竞争不仅是实现消费者利益的手段，也是提高效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优化产业结构的动力。所以，市场运行中的各类企业——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在一般情况下，均应以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参与竞争。政府确保企业平等竞争政策的中心，是抑制和控制垄断，作为制度要尽快地制定出恰当的法律条文。

催化和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是产业市场政策的当务之急。我国劳动力、生产资料、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说来还是初级的、不完善的，不仅滞后于日用消费品市场，而且受改革滞后的制约而带有浓厚的产品经济气息。随着优化产业结构进程的加快，各种生产要素的不足与积压、缺乏与过剩、存量与流量差异扩大将必然存在。如果不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很难设想产业结构优化目标能圆满有效地实现。

五、产业资本积累政策设计

资本是产业成长的基本要素，没有资本与劳动力和技术设备的结合，任何产业发展构想都难以实现。所以，产业资本积

累政策可喻为产业构想与实现之间的最佳传动带。产业资本积累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强化企业的投资热情和投资能力，诱导产业投资方向。

强化企业投资的热情与投资能力，必须使企业有足够的收益愿望，能够期待充满风险的投资带来利润，并且利润率至少是不低于长期银行贷款的利率；必须使企业能够成为投资的主体，使投资愿望可以付诸行动。为此，必须相应进行产业（企业）产权以及财政税制等的改革。产业产权改革前面已论述过，投资主体地位除国营经济外，其他类型经济的地位也大体确立，故这里侧重谈一下如何刺激国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和投资能力问题。在这里，首先是对企业管理进行权责利相结合的如承包经营等改革，其次是相应改革财税体制，使国营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投资主体，从而使国营企业可以在遵法守规、平等竞争的前提下，自主地筹措资本、自主地运用资本、自主地分享投资得来的利益，当然也自主地“分享”投资风险。

诱导产业投资方向的政策重心，是通过运用政府投资，以及政府投资的积累力和诱导力，保证现有和重组重点产业所需的资金投入，这实质是一种资本倾斜积累政策。目前，政府预算内投资不断减少，原来较为薄弱的基础产业以及有待发展的新兴产业等都面临着资金短缺困难，有限资本只有倾斜使用，才能集中力量发展重点。倾斜的产业资本积累政策的基本格局是：国家的预算内投资保国家重点，省里的预算内投资保省重点，市县预算内投资保符合整体产业结构政策的重点，用预算内投资去贴息、低息贷款、合作经营等方式引

导其他资金投向重点，金融机构的改革也要服从产业结构政策的引导以保重点。

六、产业技术进步政策设计

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化，追求技术进步已成为世界潮流。优化产业结构，不是技术停滞下的过程，而是技术进步基础上的优化；产业规模的扩张，不只是同等技术水平的规模扩大，更是实现创新、产业素质大幅度提高的扩张。所以，产业技术进步政策也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从广东省的例子看，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主要思路是：填平补齐，重点攻坚，全面提高。

“填平补齐”，就是运用技术进步政策，消除产业结构整体优化中的瓶颈。如当前我省产业结构出现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严重不适应的情况，由于技术落后而形成的高能耗生产结构是一个深刻原因。长期以来，我们采取外延或扩大再生产的方式，经济增长不是靠技术进步而是靠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持，致使生产的物质消耗水平居高不下。这样，一方面扩大生产能力本身就要求更大的物资投入，另一方面新增的生产能力又被整个生产领域高消耗水平所吞噬。可见，单纯靠扩大生产能力来消除瓶颈，也许能暂时缓解矛盾，但从长远看，根本办法还是提高技术水平，加速技术进步。

“重点攻坚”，就是对影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中，哪个有问题就解决那个。重点把握住了，全局就破题了。如农业，从生产上说，当前最主要的是抓好机械装备、改良品种、改善储蓄运输、水利设施等基础条件问题。又如工业，从宏观上，是要着力

抓好主要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以及乡镇工业的上水平。

“全面提高”，就是针对技术总体水平仍较落后的情况，实施“自主开发与引进并举，目前以引进和消化吸收为主”的技术开发策略，普遍地、大面积地提高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如前所述，这项工作是有选择、有重点、有步骤地引进的。首先是抓好重点行业、企业和产品及所有大型企业，其次是抓好各行各业及星罗棋布的中小企业，引进消化的重点是软件技术、关键设备，主要包括基础工艺技术、质检和测控技术、企业改造的专门技术、替代进口和出口替代产品技术、经营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技术，等等。

实施上述思路的主要措施有：1. 制订一个与优化产业结构进程密切配合的科技发展综合计划、专项计划（如“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2. 加快技术市场的建立和发展；3. 制订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政策细则，重点行业尤其要有明确的技术基准；4. 做好技术进步的基础工作，大力推行标准化、通用化和系列化；5. 增加技术研究开发投资，并监测使用效果；6. 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工作，尤其要对消化、吸收、创新和推广工作给予优惠。

七、产业优化的监控体系设计

优化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使有一个依据现有条件而设想的完整的产业结构框架，在再造过程中也有可能遇到种种困难；也有可能因各种条件特别是一些决定性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而必须相应调整。为了增强优化产业结构过程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建立优化产业结构的监控

体系是必要的。产业优化监控体系由信息显示体系和调节控制体系两大主干部分构成。

信息显示体系，最重要的是有一套完备的指标。这套指标不仅要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兼备，而且要先行指标、同期指标、滞后指标兼备。这套指标要有科学性，如长期以来我国以工农业总产值为中心的统计体系已显然落后，应在引进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实际加以修正和创新，使产业结构的变动态势能够迅速地、客观地表现出来。

依据信息显示体系反馈的信息而作出反应的调节控制体系，必须是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并用。金融、财政、税收、价格、汇率等各种间接或直接的经济手段，必须以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为目标合理配

套。尽管配置生产要素的过程最好能通过市场来进行，而由于体制转换、市场发育需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完成，所以，采用行政手段调节资源也是必要的。当然，将来要采用的行政手段并不是传统体制上的行政手段，而是以经济规则为依据的。其实，制定产业政策就已肯定无疑地意味着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在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政策是一种“超级”的行政手段。

产业政策需要决策管理者通过科学的方法设计和制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条合乎规律的最佳途径，作为政府宏观管理政策的不可缺少部分，引导经济高效率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省计委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振荣**

更 正

本期封面要目中《国家机构改革新思路》应删去。

1516——1987：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辛 丁

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形态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或者是产品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本特征，还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调节为基本特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来的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特别是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改革家和广大实际工作者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到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呢？我认为，其历史行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空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是彻底地排斥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未来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与商品经济水火不容，不存在任何商品、货币关系。这个理论的最早创始人，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1516年，他出版了一部对话体著作，名叫《乌托邦》。在这部著作中，他给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商品、货币的理想社会。他为了描绘未来理想社

会的基本状况，设计了一个“乌托邦”岛。岛上共有54座城市，分成四个大小一样的区。每个区的中心为百货汇集的地方。每个生产者生产的物品都必须运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并分类存放，每一户或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指定的地点领取自己及其家人所需要的物品，而不需要支付现金，不需要任何补偿。为了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管理，莫尔规定：每个城市应派三位最聪明的老人作代表，在乌托邦首府组成元老议会，来经常研究确定哪些地区多余什么东西，哪些地区缺少什么东西，在两个地区之间以有余济不足。莫尔在这里构想的无偿供应、无偿调拨、免费领取物品的社会，实质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大家庭社会。全社会就象一个大家庭，内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只有在与外国的经济关系中，在将本岛物品的1/7馈赠给别国贫民的基础上，其他物品才能以商品形式与别国进行交换。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个乌托邦社会的主要特征，莫尔还强调指出，这种未来社会的全部根本特征，就在于完全无须金钱流通。莫尔提出的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发展，都有不可低估的影

响。

此后，又有三个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提出构想。一个是17世纪初的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他曾经坐过牢，在狱中写了《太阳城》一书。他在这部代表作中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家庭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或者说在太阳城内，一切产品都是公共财产，不存在商品交换，每个公民都可以从社会中取得满足自己所需的物品。除对外贸易外，在太阳城内不存在任何商品、货币关系。另一个是18世纪中叶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他在其主要著作《自然法典》中，提出建立一个进行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征是：一切产品都经过统计，然后才在公民中进行分配，没有贸易和交换，人们生活和生产的一切都要从国家取得。为了明确表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构想，他还提出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必须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他解释说，要水果蔬菜的可到市场去领一日的用量，生产水果蔬菜的要将水果蔬菜运到市场上去。按照神圣法律的规定，公民之间不得买卖或交换。还有一个是19世纪初的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设计方案，即组织劳动公社的计划。他认为，公社的经济是“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细胞”。公社内部不存在交换关系，因而也就没有商品和货币。他不仅提出了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和理论，而且还于1832年试办了“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商场”，用劳动证券交换物品，以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

上述告诉我们，从莫尔到康帕内拉，到摩莱里，再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排斥商品经济的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否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他们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因而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及其被否定之后的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提出科学的理论，从而陷入了空想。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天才，而是历史的发展尚不具备客观的条件，因此，我们不能苛求于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阶段的情况。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阶段。这一阶段，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为标志。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不是神仙，加上他们不可能有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因而他们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不可能不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使自己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的一些设想和预测含有某些不现实甚至错误的成份。

马克思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

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都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有不少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经济与非商品经济生产方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设想未来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劳动也不表现为价值，个人劳动就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并以社会劳动的直接组成部分而存在。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更加明确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并认为如果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亡，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形态。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大约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 商品生产存在的经济条件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生产将因失去其存在的经济条件而消亡。

2.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决策中心将能直接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有计划、按比例地把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各个部门。这种有计划分配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直接劳动，不再表现为商品的价值。

3.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商品货币关系是不相容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保留商品货币关系，那么，商品和货币就将侵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破

坏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把各个社会组织分解为一群私有者，从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

4. 以公有制为基础，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

以上四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他们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劳动和按劳分配，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各国的大量实践证明，这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又证明，不要说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商品、货币关系也不可能随即消灭。这些情况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无法预见的。因此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某些观点，难免有欠科学之处。

第三阶段：列宁斯大林阶段。

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经受检验，进一步修正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列宁、斯大林领导苏维埃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在革命和建设不仅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而且突破和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理论。唯其如此，所以我们有理由把这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经

济形态理论发展的列宁、斯大林阶段。

但是，列宁也不是神仙。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也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排斥的观点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并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里把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直到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碰到了钉子，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并出现了倒退，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大困难，引起了工农群众对取消商品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强烈不满和社会的动乱，列宁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承认俄共犯了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试图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并决定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是一个从消灭商品经济的方针转到恢复和利用商品经济的方针的重大转折。它不仅在实践中使苏维埃政权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道路，而且从理论上改变了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这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恢复和利用商品经济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重大的进步，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但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商品经济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将如何存在和发展，由于列宁逝世过早，只能留待斯大林和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来回答。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苏联经济理论界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历史的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是：初级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有组织的产品经济。因

此，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苏联随着走完过渡时期而进入社会主义，将立即实行产品交换，取消商品交换，货币作为简单的计算符号将很快被取消。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不仅是商品经济的终结，而且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斯大林在苏共十七大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观点，明确指出货币将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发展商业贸易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前进。1952年，斯大林在系统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重要著作。斯大林的这部著作，从多方面探索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这部著作由于它的历史地位，无论其历史进步性还是历史局限性，都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打下了很深的印记。

纵观斯大林的经济实践和经济论著，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一、确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现实性，明确划清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界线，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这一新概念和新范畴；二、以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为依据，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三、在流通领域论证了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这一面的主要表现：一是不承认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存在商品关系；二是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

不起调节作用；三是把计划调节与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对立起来。

但是，总的来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特种商品生产”的新概念、新范畴，以及对它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的论证，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由产品经济理论到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是斯大林第一次作出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二者可以部分相容（而不是绝对相排斥）的结论，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四阶段：社会主义各国在改革中提出和实践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现实社会经济形态，基本上都是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形态。这种模式的计划产品经济形态，很快就暴露出其弊病，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本身产生了一种变革的力量，要求进一步冲破列宁斯大林阶段被确认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和1952年匈牙利为解决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而采取的一些新措施，以及1956年的所谓匈牙利事件，接着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0年的波兰事件。八十年代，我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汹涌澎湃的潮流遍及社会主义各国。不仅高度集权制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戈尔

巴乔夫的推动下，大刀阔斧地在改革，而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匈牙利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南斯拉夫也在改革。我国的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取各国之长，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引起了世界的瞩目。总结我国三十多年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贡献，在这里我认为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1.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新范畴，彻底突破了传统的商品“外壳论”和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第一次概括和简述了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统一的新观点和新理论。

3.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综合结构，把斯大林的特种商品生产论扩大为完整商品经济论，即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理论。

4. 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调节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论点，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把市场的调节作用引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机制。

5. 提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理论, 确立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自主理论, 以及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细胞理论。

综上所述可知, 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并没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终结, 其发展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样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迄今为止, 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已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 由完全产品经济理论到特种商品生产理论, 由特种商品生产理论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等四个阶段。它的这种发展, 是它由理论到实践, 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

的必然结果。它表明, 理论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修正、推动和发展; 反过来, 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这种发展, 则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有一个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历史命运, 必将由于吸收了时代的精神并走向现代化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异彩; 而社会主义经济也必将在其指导下走向现代化而越来越显示其生命力和优越性。

作者单位: 中共和平县委

责任编辑: 郑英隆



王 粲 籍 贯 辨 正

熊 清 元

王粲的籍贯, 今人主要有两说: 一说在河南修武, 如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78年10月第1版)、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86年5月第1版)等; 一说在今山东邹县西南, 如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78年12月第2版)、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79年7月再版)等。两说都有影响, 以致有人不加分辨, 将两说并存, 如吴云、唐绍忠《王粲集注·前言》(84年3月第1版)、曹大中《〈登楼赋〉——王粲弃刘归曹的信号与准备》(《中州学刊》87年第3期)即是。因此有再作考辨的必要。

据《三国志·魏志》叙王粲籍贯, 为“山阳高平”。考《三国志》, 其叙传主之籍贯有两类: 一、指明郡(国)县。如《董卓传》说董卓“陇西临洮人”。陇西是郡名, 临洮是陇西属县。二、只指出郡(国)名, 不言属县。如《方技传·朱建平传》:“朱建平, 沛国人。”沛国是郡国名, 属豫州。故《王粲传》之“山阳”为郡名, “高平”为属县名, 当无问题。再检《续汉书·郡国志》, “山阳郡”下属县中正有高平县。山阳郡高平县故城今在何处? 笔者检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及其它有关地图, 对照古今地名方位, 得知其地确在今山东邹县西南。不过1953年分置微山县时, 又已划入了微山县。

至于“河南修武”说, 乃是误把“山阳高平”之山阳郡当作河内郡之山阳县所致。肯定是弄错了。还要附带提及的是, 近来有人说王粲籍贯在今山东金乡(《文史知识》88年第3期《谈谈建安七子》), 那是误把山阳郡的治所昌邑当成了王粲的籍贯, 因为后汉昌邑县故城在今山东金乡西北。

在综合配套改革中根治通货膨胀

王燕平

1985年以来，连年出现通货膨胀，今年甚至发展到恶性膨胀的境地。原因何在？通常的解释是：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社会总需要大于总供给，经济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多，为纠正价格体系扭曲而进行的价格调整，流通领域中的官倒、商倒，乱涨价等。这些因素无疑是推动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但是，试回想一下，近年来，党和政府在宏观决策上年年都在强调严格控制基建规模，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引导消费，控制货币发行量。然而，为何控而不住呢？

一、通货膨胀更深层的原因

十年改革使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革：企业活力在增强，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调节范围在扩大，宏观管理方式在改变。但是，许多旧的体制和管理方式破了，新的体制和管理方式没有真正确立。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空隙和断层。于是，投资和消费膨胀从现行体制和管理方式空隙中蜂涌而出，难以控制，引起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在此，我们把通货膨胀更深层的原因简称为体制性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未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

者。企业改革，我们已经走了两步：第一步是放权让利，第二步是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推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这些改革对增强企业活力起了重要作用。但这只是停留在表层次上的改革，绕开所有权，只在经营权上做文章，国有企业机制不可能根本转变。一方面，无利益机制使国有资产的积累缺乏动力，企业预算软约束，使企业留利绝大部分转化为消费基金，消费膨胀遏制不住；另一方面，无风险制约，能够享受低息贷款的优惠，特别是能获得较高利润率的产业有不可阻挡的投资冲动，使基建规模压而不下。不解决企业机制问题，任何宏观调控都软弱无力。

2. 政企不分，政府的职能未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兼国有资产管理、新增资产投资者、行政管理和社会经济调节者于一身。国有资产的增减，投资效益的好坏，无人负经济和法律的责任。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实际成为考核政府领导政绩的重要指标，哪个地方上的项目多，哪个地方的得益也多。预算内资金受控制，便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银行贷款上，各地互相攀比，政府的短期行为层出不穷，成为推动投资热潮的重要成员，使压缩基建，控制消费成为一句空话。

3. 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无法避免财

政赤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37.2%降到1986年的27.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重减到50%左右，但仍坚持负担全国的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短线产品提价后，国家基本拿不到提价的好处，而提价后的负担或者通过减免税收，或者通过增加财政补贴转给了国家，使国家财政补贴的包袱越背越重；还有消费基金膨胀等原因，使1979年以来，财政连年（除1985年）出现高额赤字。其弥补方式主要是向银行透支、借款，甚至无偿抽调银行的资金，迫使银行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货膨胀。

4. 价格体系不合理，也会引起通货膨胀。

我国旧的价格体系是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动力等基础工业低价，加工工业产品高价。在十年改革中，先是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提价，后是加工工业不能消化又提价，结果陷入更高水平的比价复归和通货膨胀。

价格体系的倾斜引起了投资的倾斜。由于加工工业能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促使企业和地方政府着力向加工工业投资，尤其是高档消费品生产和楼堂馆所服务设施，蓬勃发展。这就造成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紧张状况。为了保证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发展，国家不得不集中资金扩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于是就形成了两股力量：市场拉动着扩大第二部类的生产和建设；受其影响，国家推动着第一部类的生产和建设。这两股力量的合力，导致基建规模失控、国民收入的使用额

（包括积累和消费）大于生产额，迫使财政打赤字，银行增发票子，扩大信贷规模，引起通货膨胀。

5. 现行的资金管理体制无法制止通货膨胀。

从企业和银行的内部管理来看，信贷“大锅饭”体制，带来了信用膨胀。企业用钱向当地银行要，当地专业银行钱不够向专业银行总行要，专业银行总行钱不够向人民银行总行要，人民银行总行钱不够，就抽回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专业银行实行再贷款或增发票子。银行无限制地包资金供应，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难以收拾。

从银行的外部环境来看：第一、受政府指令的束缚。中国的货币当局实质上不是中央银行，而是国务院，银行利率的决定，银根松紧的选择，都是来自国务院的指令。地方政府也经常强令当地银行对经济效益不佳但地方政府偏好的项目贷款，使地方分行左右为难。银行货币政策与政府短期经济行为高度重合。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均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宏观货币政策所要追求的适度货币供应量目标常常被破坏。第二、受财政收支状况的制约（前文已论述，从略）。

中央银行受到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在金融的宏观管理中，难以发挥调控作用。

二、综合配套改革，根治通货膨胀

如果不彻底改变现行体制和管理方式，即使通货膨胀被非常时期的行政手段压下去，过段时间，又会死灰复燃。要根治通货膨胀，必须综合配套改革现行的管

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1. 理顺财产关系，推行股份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可以使企业形成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基本设想是：

(1) 对于在国民经济中起补充作用的小型国营企业，理顺财产关系的最好办法是转移所有权，将企业拍卖。任何具有支付能力的主体都可以成为该交易中的买方。

(2) 对于矿山、铁路、航空、邮电等带垄断性的大型国营企业，现阶段理顺财产关系的重点是强化经营权，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3) 在以上两级之外的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最有利于资金的聚集和流动。

无论是小型国营企业的产权转让，还是职工集体和个人的资金在国营企业中入股，都会提高大家对企业收益和对资产增殖的关切度。企业积累越多，实力越雄厚、效益越好，所得的利润、股息和红利就越高，这就迫使企业投资要考虑风险，经营管理要考虑效益；企业和职工个人收入不仅要考虑目前消费，还要考虑资金入股增殖。从而克服企业的短期行为，为克服投资和消费膨胀奠定微观基础。

2. 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从与政府行政职能和社会经济调控职能的三位一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对政府短期行为的制约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以资产收益为主要目标的独立体系，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中央、省、市、县分层建立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各级管理机构下设若干竞争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撤消行政性公司。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直接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制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章程，对公司提供战略指导，对公司经理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根据公司的经营实绩，任免奖惩公司经理。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以资产增殖和资产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实体，它从负责现有企业资产的存量入手，扩大到对资产增量负责，投资公司则从对资产增量负责入手，扩大到对资产存量负责。这样，国有资产无论存量，还是增量，都有了产权的具体代表和经营载体，这将根本改变现行体制下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现象。

3. 实行“利税分离”，推行适当的财政包干办法，改革投资体制，消灭财政赤字。

与上述改革相适应，要实行利税分离，将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收益与作为社会管理者的税收分开，凡实行了股份制的企业，所得税率由现行的55%，降低到35%，依然以所得税形式交纳财政，作为企业向国家承担的社会义务，税后的一部分利润作为资产收益交给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部门。相应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将区分为两个独立运行的体系，一部分是由税收收入维持的经常性开支和无偿还能力或投资回收期长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另一部分是由资产收益返还形成的生产性投资。

改革现行的投资体制，扩大再生产以企业经营公司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投资

主体；社会公用设施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明确社会公用设施，包括电力、道路、桥梁、码头、港口、地方铁路、地方电讯等由地方负责，中央（包括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只负责跨省的社会公用设施和少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样，可以减轻中央投资负担，消除财政赤字，发挥各个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投资效益，加速重点建设的进行。

鉴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向加工工业倾斜的状况，可采取“国有资产大转移”的调整方式，用拍卖国有小企业资产取得的资金，投入基础产业，这将会极大地缓解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

4. 通过不断走小步的价格改革，建立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合理的价格体系。

价格改革的关键和目标在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最终理顺价格。这就是改革现存的价格双轨制，使绝大多数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决定市场化，从而使价格能够客观地反映社会资源的稀缺程度，各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比价关系基本合理。合理的价格体系，应是能使各行业获得平均利润率。

价格改革的进程主要看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现在看来，每年物价上升3%至5%较为合适。因为随着承包制的完善和股份制的推广，企业对原材料涨价的承受力越发增强，劳动生产率一般可在6%以上，工资的增长率可以高于物价上涨率，储蓄利率也在物价上涨率之上。

5. 改革现行的资金管理体制，发挥中央银行在抑制通货膨胀中的轴心作用。

(1) 强化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货币发行增长率不能

超过经济增长率与有计划地进行物价结构性调整引起的物价上涨率（剔除了物价自发上涨等因素）之和。要把货币发行作为独立的经济指标，和国家预算一样，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不能任意改变。在体制上明确，任何行政长官或行政部门都不能干预银行的货币发行。

(2) 中央银行不再向专业银行无限制地供应资金，实行对专业银行总行和分行信贷包干。实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实存实贷、实收实支”的管理办法。资金周转不灵只能互相拆借、融通，不能向上伸手，这就逼使各专业银行眼睛向下，设法多收存款，严格审查各项贷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主动地控制信贷规模，从而制止通货膨胀。

(3) 中央银行要不断改进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例如，法定准备金不应支付利息，在一般情况下，法定准备金不能转作再贷款资金，不然，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就不能发挥紧缩信贷规模的作用。

(4) 股份制企业普遍建立之后，随着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不断增强，银行要逐步过渡到不包企业资金供应。同时，银行要积极推动股票、债券发行市场和买卖市场的发展，以推动企业实行股份化。

通过企业机制转换，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财税、价格、金融的配套改革，制约投资和消费膨胀，把货币供应量和物价上涨率控制在适度增长的目标以内，根治通货膨胀。

作者单位：广州市计划委员会
责任编辑：郑英隆

仅仅一种「标准解释」。
其发展也不止一种途径和选择，当然也不
马克思主义没有「终极体系模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及其演变过程的开放性

李恒瑞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是改变那种用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去图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混同于“经典著作”编年史的状况，克服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仅仅描述成它同各种错误思潮对立和斗争的历史的简单化的倾向，因此，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要自我更新（包括对现行原理教科书的改革），而且要求对它的理论体系本身及其演进的历史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在这里，笔者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其演进过程的开放性问题，谈两点初步的看法。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演进的历史，必须承认和重视马克思主义哲

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开放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它在实践源泉上的开放性。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下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运动实践经验的哲学思想结晶，而且是全部工人阶级运动实践经验的哲学思想结晶，是在概括整个人类实践经验的“总和”的基础上形成和前进的。其次，是它在思想理论源泉上的开放性。它并不唯我独尊，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里，而是博采众长，面向人类思想文化优秀成果的“总和”。再次，是它在生活发展过程上的开放性。它并不固步自封，而是随着人类实践和文明的进步不断推陈出新。它不承认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终极真理”的性质，也不承认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能有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随着实践的发展更新内容，改变形式，而且在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充实自己，表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形成、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阶级基础和科学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代先进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以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从资本主义开始的这种开放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关系，以及由它

们所造成的开放的社会状态，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本前提，并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质，还根源于它所产生和发展的阶级基础。与资产阶级不同，大工业所造就的无产阶级，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相对立的阶级”，^②一个“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的阶级，^③代表了社会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与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本性和阶级要求相适应，真正成为一门开放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还根源于近代和现代的科学文化环境。随着自然科学从“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到“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④迫切要求冲破过去那种静止孤立和狭隘封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呼唤着以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诞生。同时，随着以“科学的科学”面目出现的包罗万象的旧哲学体系的开始解体，运用辩证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寻找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的新哲学体系就必然会产生。因而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从“知识总汇”、“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的终结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的哲学的诞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哲学从封闭体系走向开放体系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开放中发展的历史，它的理论体系是在多种模式的选

择和演进中日趋完善的历史。

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质，才能科学地阐明它的理论体系演进的历史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切不能“先入为主”，从某种“既定的原则”出发，把后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所构造的某种体系模式（例如斯大林的体系模式或以这个模式为基本依据的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奉为所谓“标准体系”，然后用它去剪裁和图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历史。以“教科书”体系为出发点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倒过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去看待“教科书”体系及其改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既然是个开放的体系，它就没有一个“最终完成”的体系模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也不会只有一种体系模式。例如，从体系发展的前后继承关系上看，可以区别为“原生形态”、“再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等；从理论内容的侧重点来看，可以区别为以主体客体关系为基本问题、以“现实的人”为核心的体系模式，和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认识论为主线的体系模式等；它在与各国革命实践和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必然会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形式。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有一种体系模式、只允许一种“标准解释”的看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和

演进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过不同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本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哲学研究工作的重点，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需要，根据当时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实际进程，使唯物主义“向上”发展，^⑤即在唯物主义的根基上恢复、改造和发展辩证法这一科学思维方式，建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创立的以“现实的人”即在历史中行动的人为出发点、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客体相统一的哲学体系，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原生形态”。此后，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演进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在其晚年认真研究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趋势，提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指出哲学应当而且实际上已开始走出过去的“知识总汇”、“科学的科学”的旧体系的迷宫，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开辟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列宁主要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他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哲学已经集中于认识论研究并更多地从事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伪造的状况，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实践时期和“物理学革命”都已把认识论问题提到首位的客观要求，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同一个

东西”，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这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演进史上的“列宁模式”，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再生形态”。其后，斯大林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构造了一个板块结构的“斯大林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现行的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模式。“斯大林模式”显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它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一个环节，一种尝试，或者说是一种“次生形态”。毛泽东则更多地继承和发挥了“列宁模式”并明确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一重要论断。自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演进和发展，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点，出现了多种理解和模式。当前，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主体客体的关系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又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及其演进过程。每一种体系模式都有其一定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根据，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不能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应进行科学的分析，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指出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道路和历史趋势，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推进它的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社会正经历着它诞生以来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改革和现代化的实践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

视野，推动着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时代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要求我们站在新的认识高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演进的历史及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了今天，它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必须自我更新，增强活力，与时代同步。为解决这一任务，我们不仅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道路和规律，还要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中那些过去长期被忽略或置之不顾而在改革、现代化进程中又不可缺少的方面。例如，马克思对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的论述和他提出的“社会发展三形态”图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论点，马克思、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开放理论，列宁的“新经济

政策”等，这些极富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或者作为“非正统的”、“不成熟的”东西而被搁置一旁。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它们却越来越显示出真理性的价值。依据现实生活的变化和要求，从思想史的回顾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获得新的理论启发，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必要环节。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编》的结论，本刊作了删节。）

-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67、41页。
④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37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所
责任编辑：达才



个人主体、集体主体和社会主体是构成主体系统的三种基本形式；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则是客体系统的三种基本形式。社会主义主体与客体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相互转化而形成生生不息的辩证运动，并与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既相一致，又有区别。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

张江明

认清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规律，达到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特点与性质

主体和客体这对哲学范畴，在社会主义辩证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巨大作用。马克思曾说过：“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①这是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简明定义。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体是指具有意识性、社会性、实践性、能动性，可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的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庞大的复杂的动态的总体系统，它包括两个大的子系统，即社会主义主体系统和社会主义客体系统。社会主义主体系统以人为中心，表现为个人、集体、阶级、政党、领袖和人民群众。在多种多样的主体形式中，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形式：一、个人主体，即主体是个人、个体。个人主体是集体主体的细

胞，是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往往体现在个别人的认识和实践水平之中。杰出人物对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个人主体总是有局限性，包括伟大人物也是如此。所以，不能停留于个人主体，应向前推进和提高。二、集体主体，即主体是群体，超出于个人范围。集体主体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宗旨、利益、要求等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群体。如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科技组织、教育组织、社会科学组织、各种群众组织、以及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企业的组织等等。集体主体能发挥和创造一种新的功能，大于个人主体的能力和作用。三、社会主体，是在全社会中起作用，并能代表社会总体的。它是主体的最高形式，例如政党、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在阶级社会中，主体不可能是整个社会，因为从事活动的主体是该社会中互相对立的阶级和代表这些阶级利益的政党。只有到了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体。

我们把主体区分为个人、集体和社会等形式，是从主体的活动结构、范围来说的。这三种基本形式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

社会主义主体和各个社会形态的主体有共性，也有个性，具有新的特点。可以说，社会主义主体是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型主体。社会主义主体的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主体的新特点突出地表现为：

社会主义主体的人——人民群众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地位、尊严和价值提到很高的程度。人民在社会和国家中当家作主，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原来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变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而原来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这个阶级中的人，绝大部分逐步地改造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取得公民的权利。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已经成为新型工人、新型农民、新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从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起着一定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它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肝胆相照。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实行党政分开，充分发挥政权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不包办行政事务工作。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方针政策领导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人事安排，党提出建议。

社会主义主体所以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客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化所带来的。因此，还需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客体问题。

社会主义客体是指社会主义主体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包括社会主义社会自然条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客体有多种形式，可以概括为：一是自然客体，即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马克思很重视自然客体，认为自然界就是客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②主体的人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他的对象性客体当然是自然界；如果离开自然界，便不能进行对象性活动，连自身存在也不可能。自然客体的范围很广，不仅指日月星辰，山林湖海等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且包括在人的生产活动中制造的自然物即人化自然，例如人造纤维、合成材料等等。从认识论来看，自然客体可以分作两个部分，即人的实践和认识还未到达的自然界；以及作为同主体相对应的自然客体，成为主体实践和认识对象的领域，不是整个自然界。二是社会客体，就是把社会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客体，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现象、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规律。作为主体的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产物。社会客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统，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社会规律也是很复杂的。人们对自然界进行改造时，也把社会当作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即把社会当作实践和认识的客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则是社会的。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和改造社会客体，促进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三是精神客体，即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它是精神活动的物化，通过物质外壳或物质载体表现为精神产品，例如，以书籍、录音磁带、电影拷贝、计算机贮存系统等物质形式为载体，以文字、语言、图形、符号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科学著作、文学作品、艺术品、科学技术等等。当这些物化的精神文化成果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时，它就转化为精神客体。这些精神客体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客体的共性，主要是物质性、客观性、历史性和规律性。对于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的物质性，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而精神客体也有物质性，似乎难以说清楚。其实精神客体是物质的反映，而且是有物质根源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③它是自然以及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并借助于物质外壳表达出来，客体的普遍特性是它的客观性。无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还是精神客体，都是客观存在，不以主体的意识为转移的。社会是

由人组成的，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都不会改变社会客体的客观性。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按照它的客观必然性而运动变化。客体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客体的范围不断扩大，客体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升华。客体的发展也是有规律性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以不可抗拒之势，经过曲折过程，奔腾向前。精神客体也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任何人要想获得优良的精神产品，就必须承认精神客体的规律存在，认真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

社会主义客体同其他社会客体相比，有着自己的新内容、新特点，主要表现为：

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客体的形成，使被束缚的旧的生产力得到解放，新的生产力得到保护和发展，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向前迈进，使生产不断扩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人民虽然基本上达到小康，但还有部分地区未曾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生产发展速度比较曲折。这都是暂时现象。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总是或迟或早会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客体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在生产关系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同时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管理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以及多种所有制互相渗透、联合、股份的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与此相适应，以按劳分配占主导地位的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这是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多层次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客体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前我国仍处在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变之中，通过改革开放把僵化的经济模式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客体是过去所没有的。

在上层建筑政治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日渐健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发挥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客体的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

我国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大量的主要的矛盾是非阶级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适应这样的新特点，对于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要进行打击，以维护社会主义的秩序和安定，这是属于专政方面。还应更多地着重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发扬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充分调动社会主义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当家作主精神。社会主义法制也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对敌人实行专政、维护社会治安的法制，以及对人民实行民主、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和发扬人民民主的法制。把两者结合起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着重点。这样，社会主义客体的政治基础就会更加稳固。

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主义成为统领社会主义主体对社会主义客体进行认识和实践的指导思想，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保证它的方向正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文化、教育、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方面，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自我否定、自我完善来解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又相适应、又相不适应的，是又相矛盾又相统一的，它们之间的适应是基本的，但又普遍存在矛盾。要及时地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环节和因素，建立最能适应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结构、体制，促进生产力顺畅地发展。

二、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作为两极，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和作用，它们是对立的。但是，主体和客体都属于统一的物质世界，在本原上是一致的，它们又具有同一性。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问题，总的目的是为了弄清社会主义主体和社会主

义客体的辩证关系，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为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服务。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主要是通过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这是达到二者统一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在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中，离开了客体就无所谓主体，同样，离开了主体就无所谓认识的客体。它们是互相依赖，一方的存在以他方的存在为前提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在多方面，只要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会确实存在一条由此到彼的桥梁，就会相互之间发生作用，不是仅限于一方起作用。因为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更要通过实践这道桥梁来达到。费尔巴哈承认“主体和客体的同一，统一”。认为主体和客体是有区别的，但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指明“这是思维和生命、哲学和生理学的真正原则。”^④这是正确的。但他只看到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没有看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这样的看法就不够全面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是普遍存在的，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通过长期的不断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一步一步地建设成功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方面，社会主体作用于社会客体，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法，根据实际情况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环节、体制和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客体作用于社会主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增强，从而推动文化教育和科技的普及与提高，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科学管理方法的采用，促进社会主体的素质提高，主人翁责任感增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人大批造就，等等，使社会主义主体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它们都存在能动和被动问题，不能认为主体永远是活动的出发者，始终处于能动的主导地位，而客体则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永远是接受者，因而简单地把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看成是能动与被动的对立关系。

马克思比较早就指出，主体的人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可以作用于对象，而又是受制约的。

不是只有能动性，没有受动性。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⑤

人从物质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一方面，由于主体的人有意识、能思维，可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作用于客体，改造自然界，这是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人仍然是物质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活、生存和生命过程，仍然依赖于物质自然界，不能离开社会客体，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是主体的受动性。所以对主体的全面认识，不是只有能动性，没有受动性，而是能动和受动相结合。究竟那个方面占主导地位，依实际情况而定，一般上更应重视发挥主体符合于客体的能动性的。从外表上看来似乎客体只有受动性、没有能动性，其实并非如此。它的能动性表现形式不同，是通过制约性、依赖性反映出来的。主体实践能力首先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社会已达到的生产力状况直接制约着主体的实践能力。其次，主体实践能力还需要受政治条件和社会精神条件的制约。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与状况制约着主体的素质，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主观的实践能力。主体的精神生产必须依赖于物质生产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受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制约。主体的人有目的地进行活动，这个目的好象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来确定目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⑥“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礎。”“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对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⑦客观世界是有规律地运动发展的，违背规律就要受惩罚。这也是客体对主体的制

约,从一定意义来说,表明客体也有另一种形式的能动方面。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是互相创造的,不能固定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是创造者和被创造对象之间的对立,不能把主体看成永远是创造者,客体只能是被创造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⑧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吗?不就是互相创造、并非只能主体创造客体吗?

当主体出现以后,他和客体同步并行,并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主体和客体也都得到新的发展。它们是互相创造、互相推动、互相转化的。马克思指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对象生产主体。”^⑨这里所说的“对象”,是指客体,“生产”是指创造。从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来理解马克思这两句话,也就是主体创造(生产)客体,客体(对象)也创造(生产)主体。

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来看,每个社会和历史时期,生产力状况和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基础,国民经济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程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层次,等等,都是由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⑩而每个社会客体所创造的主体的人都不相同,即都出现新的主体的人。例如,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奴隶主的主体,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的主体,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体,等等。阶级社会中的主体分裂是为不同阶级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又是有同一性的。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创造社会的财富,推动社会的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体的人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新型的主体。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消除主体的阶级分裂,形成全社会统一的主体。社会主义主体的人是“四有”新人,共产主义主体的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是更高形态的主体。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体的状况、形态、表现、性质不相同,这是由社会客体决定和创造的。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互相转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即主体转化为客体和客体转化为主体。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⑪生产活动是一个主体和客体互相转化的过程,一方面,人们在生产时总有一定的目的、计划、要求,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物的形式,生产一定的物质产

品。这种产品意味着主体的能动活动转化为物质存在形式,即主体的客体化。另一方面,客体的主体化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主体从劳动中生产的产品,一是作为生活资料加以消费,用以维持主体的人的生命和生活需要,以及人的再生产;二是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费、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变为动力,增强主体改造自然的能力。没有这种转化,主体的生命延续和主体能力要素的增强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主体的客体化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社会活动、生产活动等实践所取得的客观现实成果。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各种产品的丰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以及四个现代化的成就,等等。这都是社会主义主体客体化的表现。而社会主义客体主体化,是指社会客体对社会主体的作用及其引起社会主体的变化。还应认识,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互相转化,并不是主体直接变为客体,也不是客体直接变为主体,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经过实践及其中介环节,各向着对方的目标和位置转化,共同得到增强和提高。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互相转化,同主体和客体都具有两重性有直接关系。从主体的人同社会客体的关系来看,每个人都是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而存在的,人生活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要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因而人自身就具有主体和客体的两重关系,即是说,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主体,别人是客体。所以,主体和客体是互相转化的。主体中有客体,客体中有主体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客体的承担者,这是主体中的客体;而在生产力的客体中,人是第一个因素,这是主体中的客体。这种主客体的两重性是普遍存在的。主体和客体相互转化的形式、途径多种多样,我们应从实际出发,研究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的条件、形式、内容和实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同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是有紧密联系的。它们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在世界上只有人,才有精神、思维、意识、理性,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前面说过,主体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的意识性、能动性。主体的能动性来源于精

神、意识的能动性。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主体和精神有一致性。但是，主体和精神又有区别，因为主体的人有两重性，他既有精神一面，又有物质一面。所以，不能把主体和精神完全等同起来。讲到客体和物质的关系，按照马克思关于“客体是自然”的观点，客体和物质相一致更加明显。客体具有物质性客观性规律性的特点，表明它和物质有共性。但又不能把客体和物质毫无区别地完全相等。因为客体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客体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其他物质运动，都属于泛称的客体，即广义客体，在这方面，客体和物质是一致的。但是，作为认识论的客体，则是特指的客体，一定范围的客体。认识论的客体是指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未与人的实践和认识发生关系的事物属于自在客体、自然客体，即广义客体。当人的实践和认识自然时，便成为自为客体，特指客体，即认识论的客体。在这方面，客体和物质是有区别的。物质比客体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客体属于物质的一个层次。决不能把客体和物质相分离，或认为客体可以脱离物质而存在，这是不可能的。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当然是本体论或本原论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认识论有它本身特有的系统和内涵，但认识论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同哲学基本问

题相关联。完全和哲学基本问题无关的认识论是不存在的。

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统一的，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高度概括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和互相转化。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也是这样的。应用社会主义辩证法观点认清社会主义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对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很重要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530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 ⑤ 同②第167—168页
- ⑥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1页
- ⑦ 同⑥第200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 ⑨ 同①第95页
- ⑩ 同⑧第603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范英

更正启事

本刊1989年第2期封面、封二、封三、封四照片，除“西江石料厂产品”、“德庆稀土冶炼厂产品”、“德庆丝织厂生产的软缎被面”、“德庆首乌酒、汁和巴戟补酒、汁”等4幅之外，均由麦庭发摄。由于本刊工作疏忽，摄者姓名漏署，特作补充说明，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学术研究杂志社

1989.5.20

系统哲学是东西方哲学统一的基础吗？

——“依·拉兹洛教授一席谈”之商榷

乐志强

《学术研究》1988年第4期《美国系统工程学者依·拉兹洛谈中国改革与哲学》中，拉兹洛提出：

由于“系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当代形态，而中国目前的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所以，“中西方哲学应该而且很有可能在系统哲学中接近”，“用同样的思维方式——系统哲学进行思维”，或者说，“这就是我们之间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哲学基础。”依·拉兹洛教授这番话，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既然“系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当代形态”，“一种新形态”，中国目前的哲学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这样，依·拉兹洛教授的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系统哲学是东西方哲学统一的基础。这就有必要把系统哲学同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一个比较，看看究竟是谁向谁接近，谁是哲学统一的基础。

首先，系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确有许多“接近”的、“相通”的地方：

第一，二者都反对只从微观、局部去作片面的分析，强调要同时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事物，并且强调系统的整体功能不等于其构成要素功能简单相加的总和；

第二，二者都反对机械决定论、单向决定论，强调相互作用、双向决定作用，强调系统整体内各构成部分之间的相关性、协同性和有机联系；

第三，二者都反对孤立地、表面地、单层次地看事物，强调要从普遍联系、从系统结构功能、立体综合地去看事物；

第四，二者都反对用绝对静止、绝对

平衡的观点看世界,强调要用相对静止(稳态)、动态平衡和不断进化的观点看世界;

第五,系统论认为,开放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当系统达到某个目的点或目的环时,会实现自组、自稳、从无序走向有序。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这类术语作类似的说明,但是他却反复论证,社会上的人总是在一定目的意图支配下行动的,通过生产劳动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通过各种社会交往进行物质、精神、信息的交流,并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就可以使社会秩序稳定、使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其次,我们又要看到系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完全“接近”、“相通”。所谓系统哲学,按照贝塔朗非在《一般系统论》(1973年修订版《序言》)的说法,它包括“系统本体论”、“系统的认识论”、“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或是哲学语言中叫做‘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对比研究。

第一,所谓“系统本体”,贝塔朗非叫做“野生的自然”,拉兹洛称为和“人造系统”不同的“自然的系统”。他们认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再到社会系统,宇宙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基础。这是什么呢?拉兹洛说:宇宙“不是由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而是由一定构型的流构成,这种流弥漫在它的各处。这流动的是一种玄虚的、未分化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能量。”只是当这种能量流到某些区域,由于出现了“干扰”,“变弯曲了”,“一部分自己形成纽结,盘绕成相对稳定的形态”,这时才产生出宇宙万物来。这种从“玄虚的、

未分化的”“能量”流出宇宙万物的观点,同恩格斯批判过的杜林关于从非物质的、神秘的“宇宙介质”演化出宇宙物质的观点,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因而这种观点和马克思关于宇宙起源于并统一于物质的观点怎么“相通”?

第二,在认识论问题上,虽然彼此都反对照相式的机械反映论,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相互作用。但是系统哲学强调到这样的地步,以至贝塔朗非认为:“知觉不是‘真实事物’的反映(不管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知识不是‘真实情况或实在’的简单相似,它是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取决于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和语言性质的因素的复合。”(《一般系统论》第6页)这和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怎么统一起来?此外,拉兹洛曾说:“当你我注视着同一幅画时,你是从一个不同于我的角度去观看它的,而且即使我们交换了位置,我们的全部知觉也还是不同;在两个时间之间,世界并没有停止它的进程。……由于环境世界和感觉者联系的变化(无论是多么微小),不会存在两个恰恰完全一样的感知领域。”(《系统、结构和经验》第129—130页)这不是完全陷入相对主义之中了吗?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性与绝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又怎么一致起来?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意识、思维、语言等也是人所独具的特性,但是生产劳动交往活动和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才是对人的本质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的本性、本质就是在

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前提，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人和世界的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关系。系统哲学虽然也讲人、讲人和世界的关系，但是在它看来，人、社会和其它物种一样，都只是一种“自然的系统”。人除了“意识、抽象思维、语言、感情，以及表述和体现出以上这一切的那个信息交流”之外，人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傲视于其它物种的，甚至“人所独具的一切，同长颈鹿的长脖子、飞鸟的翅膀或食蚁兽的那条鞭状的舌头相比，无所谓什么更好一些或更坏一些。”（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第76—77页）贝塔朗菲为了反对“刺激—反应图式”、反对把人变成“机器人”，甚至连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行为受经济原则支配”等也一概否定。这样，系统哲学又怎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起来？

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包括人口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标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要求；历史上的诸社会形态就是按照这些基本历史规律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依据这些规律必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所有制将被社会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系统哲学把人类社会称为“社会文化系统”。在它看来，虽然“在文化当中有许多加速或延缓社会进程的因素”，如工具、技术、法律、商品交换、信息交流等，“但是，超出这些因素，在这些因素之上，有一套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因素，因为正是它

影响到任何一种特定的技术、法律和交流的持续存在，增长，或衰败。这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套价值标准。”（同上，第91—92页）拉兹洛认为，宗教的“救世、慈悲和纯洁，正大光明、灵魂超脱（涅槃）和禁欲主义”的价值标准，“物质主义”的“美好等于生产——每种东西生产得更多，生产规模更大，就更美好”的价值标准，都是不合理的。那么，合理的价值标准是什么？他认为就是“生存、相互合作、养育儿童、崇拜卓越的存在物、避免苦难、避免非正义和痛苦”、“能够同地球自然界……和谐共处。”（同上，第97、110页）至于过去为什么出现那样价值标准？今天又怎样实现价值标准的转变，似乎都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总之，只要大家接受系统哲学这个主张，改变价值观念，东西方就可以趋同、全球就可以“和谐共处”。这就不难看出，系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还存在多么大的距离。

我并不是说，系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当或不可能“趋同”，也不是说马克思的话句句都是不可移易的终极真理。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过去，它是在总结全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基础上产生的，今后，也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才能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在上述彼此分歧的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上，到底是系统哲学站得住、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得住？因而，到底是谁应当向谁“接近”？应当以谁

为基础实现“趋同”？

我认为，系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不仅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还存在一种互补关系。一方面，系统哲学在总结现代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成就的基础上，对各种系统（特别是自然界和工程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转换的分析、控制等等，比马克思主义更切实、更具体、更科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向它学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作为一种既唯物、又辩证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比系统哲学更彻底，它的根基更宽广、更坚实。贝塔朗非早就说过，马克思是系统论的理论渊源之一；美国的D·麦奎里和T·安贝吉更加肯定：“可以把马克思称为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他的理论工作的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富有成果的现代系统方法研究的先声。”（《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6期

第1页）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由生产力（其中他又把物质生产力区分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生产的脉管系统）、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理论、社会形态合乎规律演进的学说等，较之于系统哲学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而这正是系统哲学的不足，象许多系统论学者指出，在这方面，它应当更多地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因此，为了实现东西方哲学的“趋同”、全球思维方式的一体化，系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必须进行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用系统哲学的积极成果来丰富、完善自己，而系统哲学必须在上述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上向马克思主义看齐。这样一来，实现“趋同和一体化”的基础就不是系统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产生真正的学术化科学化的文化研究，使迄今中国文化研究仍然在政治的急功近利与传统的思维模式夹击之下不能脱身。目前流行的“大文化”概念，其实是掩饰这一方向性偏差的谬误。

科学实证是中国文化学术走向现代的必经阶段。科学实证方法将根本改变传统思维模式，把中国文化研究送入正轨。这也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观的超越。

超越“五四”新文化观

——本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桑 兵

中国近代新文化在经历了戊戌、辛亥的孕育生长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从政治思想领域扩展到学术领域。除政治意义外，文化探讨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但70年来，文化热几经涨落，始终处在政治与学术相混杂的状态。政治上的紧迫感引导文化研究追求过于功利化的目标，而文化研究的急功近利又进一步加强着政治上的目光短浅。从学术角度综观本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历程，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没有用科学理性精神，即科学的态度、观念和方法来认识分析新文化。五四的文化反省受着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而五四以后的文化研究又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的正途恰是世界文化研究的岔道。也许主导趋势的不同，反映了两种文化内在的差异。但是，如果这种差异显然已经把文化研究引进迷宫，就不能不考虑突破的方法和方向。

新文化以来的文化热，大体上有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80年代的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之争，60—70年代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新儒学思潮、80年代中期的大陆文化热及其外部回应等几次高潮，在规模、影响上构成本世纪中国文化探索的主线。其社会政治意义自有公论，不在本文评论范围。就学术而言，即使有所发展上升，也是螺距小而螺旋大。

比较一下上述几次热潮，有如下共同特征：

1. 导源于紧迫的社会政治需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适用性。文化探讨不仅试图直接引导民众的观念变革和价值取向，而且有着潜在或直露的影响当局决策的强烈主观意向，因此往往营垒分明地以论战形式展开。双方学术主张的胜败沉浮，关系到地位和权利，从而卷入思想权力化的旋涡之中难以自拔。文化的超时空性在研究中很

难有所体现。

2. 以单一的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进行抽象笼统的类比。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先进文明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强劲冲击和严重压迫,使得人们的文化思考急于找到对应,在中西文化比较基础上探索传统与现代化演变的关系。这种单维视野影响了人们对文化问题复杂性的多向思维,由简单类比演化的非逻辑思辨,长期不能摆脱异同优劣的概念判断,认识比较停留在最单纯的内涵层面,忽视了对不同文化本身的深入研究。其论点论据既无法实证,更难以操作。尽管后来规定了存精去芜,洋为中用的抽象原则,但对于评判分析具体事物作用不大,只有政策意义,而缺少学术方法价值。

3. 文化研究在学术领域主要是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的直接介入,在对象、观念、方法、命题方面不能与后者界定开来。这一问题70年来没有实质性变化,社会变动只是一次又一次促使人们旧调重弹。

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研究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首先,除社会需求外,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引发文化研究的重要力源,也就是说,不仅社会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发展也提供了创造新方法以解决新问题的条件。其次,西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被资本罗网裹进世界体系的各种千姿百态的文化,要求视野多维,对象具体,逐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再次,欧洲是在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形成文化研究,以文化人类学为前导,横跨各个社会人文学科,同时又与各相关学科有着明确界定。

当然,为政治与为学术的文化思潮在东西方都同时存在,区别在于,中国始终未能建立起学术化科学化的文化研究,为政治与为学术不是并存,而是初生阶段的混沌。学术研究首先应具有学术价值,才能产生深入持久的社会效应。西方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经历了各专门学科长期科学实证研究,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积累和理论方法准备,最后孕育出新的学科分支。

2

各国文化传统有别,需求各异,出现不同趋势当在情理之中,并无此优彼劣之分。但是,科学发展毕竟有阶段性程度差异,中西文化研究的不同,更多地反映了学术发展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

近代文化研究在欧洲正式形成于19世纪中叶,以泰勒的文化人类学、斯宾塞的社会超机体论、达尔文《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和欧洲文化史运动为代表。如上溯文化史源头,则达到18世纪中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家为了反对宗教神权,借鉴中国传统道德理性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建立近代科学理性文化。这是欧洲宏观与批判文化的时代。到19世纪中叶,文化研究经社会人文学科的长期发展孕育,终于破土而出。这时,由于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变迁和相互交往的扩大频繁,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发现的社会及人类自身的问题,文化研究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传统学科所不能涵盖的问题。而近代中国的学术是在西学东渐风潮影响和新式教育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形成,清末显露端倪,民初略具规模,因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几乎是与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创建同步展开的。由于后者未经充分发育,使得文化研究带有严重的模糊笼统性。要在用新观念重建文史哲架构的同时,完成宏观与批判文化的导向比较,和建立新兴文化学科的三重使命,的确为当时人力所不逮。人们无法界定和把握后起的文化研究与传统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区别,往往用文史哲的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来对待文化问题,或是用皮相的文化观念重解文史哲命题。这样,文化研究非但不能克服旧学科的固有局限,反而把各种局限集中到一点,成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招牌更新。人类的认识没有深化,却有冒名顶替之嫌。文化研究从传统人文学科分离出来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变得令人难以捉摸了。

这种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和价值本来是明确的。西方早期文化研究的重心在初民社会,由于基本没有典章文献作为资料,人们只能通过器物遗留、习俗风尚等等来探讨一般社会成员的普遍规范与模式,分解出潜在的群体心理定势,非直观地揭示人的文化习得性,因此要求有与主要以文献资料为据进行研究的文史哲完全不同的观念和方法。这里的“文化”实际是与“自然”对应。本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研究出现时间下移(由初民到乡村)和层面下移(由精英到通俗大众)的趋势。与哲学、思想研究以精英见诸语言文字的主观认识为依据不同,文化研究始终以一般社会成员常规、实际的心态行为作为认识范畴。从根本上说,文化研究就是具体实在地探讨

人们主观意识与社会活动及其结果的相关关系。人的意识活动至少可分为三个层面：1. 心有所悟并用符号有意传达出来的认识。2. 内心所想但并未公开表述，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测度得到的主观意识。3. 既未想到更未表述，但行为及其结果显示有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定势在无形地支配制约，这种潜在意向往往与主观意识不符甚至截然相反。考虑到文化分层的客观性，民众的心态大都不能以语言文字直接表达，或即使表达也很少记载，保留着初民文化的混沌性，面向精英的意识形态或思想分析法当然无能为力或效果不佳。五四以来文化研究的主流顶多是在精英层增加了一些心理分析，或扩大代表人物的层次，由思想史向思潮史过渡，并没有直接接触及大众层。这种以精英层为对象的思想哲学式文化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文化带来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解，表现为：1. 以精英统治文化涵盖中国文化。从思想史角度看，一般民众的确没有完整的体系化思想，因而不免在一些方面向统治文化认同。但文化研究表明，民众在实际生活中有着不同于精英层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他们或许并无明确认识，却共同实行。用精英层涵盖中国文化，必然导致否认一般民众的文化实体性。例如上层社会奉行宗法制，严格长幼嫡庶，民间则是诸子析产制，有“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的民谣。不改变思想哲学研究的观念方法，即使探讨文化范畴，也很难准确揭示实际情形。2. 一些研究者虽已转向分析民众心态行为，但仍然单纯依据精英的记载描述和评价。这些经过精英文化眼镜透视的心态行为，难免扭曲变形，不能直接地有效还原。依据诗词、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来认识民众文化，不能不注意剔除作者的个性主观因素及其反映层面的局限性。3. 以思想哲学层面的理想规范作为现实的文化规范。儒家思想的许多成份，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又包含文化精英的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意向，即是理想的而非实际的思维行为准则。如儒家倡导孝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民间也向往多子多福。但现实中人口膨胀和土地有限之间的尖锐矛盾，迫使人们以溺婴、战争等形式，有意识或本能盲动地控制人口，恢复平衡。又如观念上提倡父权制家族式大家庭，实际则以核心家庭居多（由于经济水平、土地资源、医疗卫生条件等等限制）。尽管社会成员主观上普遍以大家庭为楷模，实际通行的行为规范只能由核心家庭占

主导这一现实来规定和制约。对于后者，思想哲学研究显然无能为力，即使勉为其难，也必然引向主观意向的岔道。另一个突出事例是，道德礼教与城乡普遍存在的纵欲和性混乱现象之间，既有严重冲突，又有某种协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剔除主观褒贬，显然反映了现实规范的对立。单从思想哲学角度认识传统文化，只能把思想等同文化，理想当成现实，无法真正认识文化范畴。与理想不同，这些规范准则大都没有明确形诸文字，甚至没有明确共识，而是大多数人对待同类事物的反应和态度，显示了某种他们本人也不确知的共同意向。通过这些无意识行为和心理定势，可以揭示出客观存在的无形规范。

3

五四新文化在社会政治观念上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而文化观念只在某些层面实现了转型。虽然民主与科学作为口号提出，但科学主要被当作反对迷信的武器，人们是用非科学的态度方式来鼓吹科学精神，缺少科学理性成为通病，文化更新在传统文化影响和对外来异质文化隔膜的双重制约下，走上似新还旧的畸变历程。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由于体脑分工和城乡分离，原始文化的混沌性被打破，形成精英、通俗和民间三个文化层次。近代以前，中国精英文化对于文化的理解是文治教化，否认一般民众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实行文化统治，把自己的准则规定为社会准则强迫民众接受。尽管精英文化实际上不断从通俗民间文化中提纯，但双方从来不处于平等对应地位，民众的行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没有被当作一种文化形态加以承认。思想哲学式的文化研究明显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即使主观上有以民众为主体的意向，方法的局限也使之无从入手来解决问题。近代以后，城市发展使通俗文化突飞猛进，超越精英和民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人们感受到通俗文化存在的实体性。但这时通俗文化尚处于自在状态，是盲目的非理性发展。随着精英文化垄断被打破，从中分化出新的理性文化。其内容抽象地承认一切社会成员自我价值的合理性，但形式上仍以说教形式向民众传导灌输新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民众文化的实在性变成了主观认识的结果而不是依据。这种内在矛盾反映出文化观过渡转型期的双重性。而近代文化成熟的标志，不是精英文化以统治、说教来控制支配民众，也不是通俗文化的本能发展，而是在二者之间建立协

调机制，精英文化承认通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并作为平等的文化实体看待，客观地研究民众文化的形态、结构与运作规律，把强制性的统治支配和英雄说教转为管理型的影响引导；而民众文化也自觉地接受理性制约。这种结合的中介主要不是通过权力。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历次文化热都没有跃上这一境界，在思想政治领域，仍是说教控制型；在学术领域，通俗文化并未成为精英意识的客观平等对象。由于中国较早进入四民社会，都市商民经济比较发达，通俗文化长盛不衰，从精英到精英和自发的通俗文化并不能真正超越传统。

是否从一般社会成员实际的心态行为作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差异，这使得中国文化研究很难独立于传统人文学科。目前人们已日益感到这一严重缺陷，指出：民国以来的社会文化、民众心理、民间思想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姜义华：《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嬗变轨迹的新探索——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问题在于，这一根本性缺陷影响了整个研究观念、方法的变革创新，使中国文化研究难以与传统人文学科脱钩分界。当然，没有前人工作基础、资料难找等客观条件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一方面受传统学术观念影响，仍把民众视为无文化规范的完全被动群体，因而没有或不知如何收集、整理、运用有关的资料，另一方面，与政治关系的浑沌及与思想哲学的混淆，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种种捷径，诱使人们变换招牌以追求急功近利的社会效应，而不允许另辟蹊径。结果，文史哲喧宾夺主，在哗众取宠的同时把固有局限原封不动地转嫁到文化领域，而正宗的文化研究反而因为起步艰难，见效较慢而不被重视，甚至被排斥于文化研究之外。五四倡导新文化至今已70年，文化研究的发祥学科仍然鲜为世人认识，而且一再出现这种怪世相：模糊变形的观念冲击从者如云，一旦科学的文化研究来临，人们便知难而退，反而和者盖寡了。例如，大陆文化研究中断80年后一朝恢复，便迅速涌现大批专家，令人对这种简单移位的积极意义颇为担心。试图以直接进入文化研究领域来摆脱传统人文学科面临的困境与危机，结果却把文化变成一切危机的总倾销场。另一方面，本应承担文化研究重任的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后起社会人文学科，又刚刚复苏或长期脱离

世界学术主潮，颇受冷落。这一内在矛盾构成了大陆当前文化热的根本危机。

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双方均以笼统抽象的感觉或个人体验对不同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轻而易举地提出几十项似是而非的对比范畴，最典型的是人们惯常引用的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当时人关注的热点，如传统问题，国民性问题，无论观点如何，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态度方法本身就是非现代性的。这种随意性成为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严重障碍。20年代的科学和玄学之争，实际上仍然是两种哲学思想的冲突，而不是科学与玄学的斗争。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认识的扩展加深，文化论战的局限性日益显露，正规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引起一些人关注。他们开始摆脱对应式的思维方式、急功近利的价值追求和政治从属地位，用地道西方现代的态度、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的文化形态与结构，从现实出发，而不是由观念到观念。于是，产生了费孝通《江村经济》这样对世界文化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里程碑之作，推动研究重心由初民社会转向乡村社会。这不仅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认识，学术上也与传统人文学科严格区分，为用现代方法理论全面具体深入精确地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提供了良好示范。费氏关于乡土中国四种权力关系的分析论述，改变了原来民主与专制对立冲突的简单对应和纯理论分析，有助于促使人们将目光从观念冲突转向近代中国政治结构变动的实际过程。科学实证是中国文化学术走向现代的必经阶段，它将根本改变传统思维模式，把文化研究送入正轨。遗憾的是，人们没有充分认识这一转变的价值和意义，使之中道夭折。不是追寻五四的新文化理想，而是把五四新文化当成文化的理想范型。因此70年来一次次回到五四，却难得有人超越五四，甚至把复归视为超越，而把超越认作歧途，无法进行学术鉴别和评判。至今还有不少学者以貌似宽容的“大文化”概念掩饰学术方向的偏差，用“全面”将超越的意义抹煞得一干二净。诚然，广义而言，传统人文学科都可纳入文化范畴。但我们不应忽视科学发展有联系也有区别，对于文化研究前学科发育生长并不成熟，又没有经历科学实证阶段的中国学术界而言，指出区别无疑更为重要，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异质文化移植中的含混和学术自身发展阶段性的模糊，真正推动文化研究的深化。

本文强调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化

过淡政治色彩太浓，以及泛人文非文化的倾向，希望加强实证性，把文化研究引上专门化，科学化的轨道，使之真正超越传统人文科学的局限，确立独立的学术价值。但有两点应特别指出：第一，提倡科学实证决非盲目步英法后尘，任何学术主张都不能十全十美，科学实证当然也不是万能。但只有经历这一阶段，才能产生独立于政治和其它学科的文化学，超越旧的模式。这决不意味着抹煞以往的文化研究，因为它代表着另一个必经阶段，实际上促成的是中国近代人文科学在移植西学基础上的重新建构，一般人文科学的成熟更加显示出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形成界定的条件。现在也有一些欧洲学者尝试突破实证方法的局限，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法，形式上似乎接近中国文化研究的主流。然而，正如西方人从中国画中发现某些类似现代派的观念技法，不等于中国画属于现代派一样，这是两个不同阶段的近似重合。主观上要求缺陷补偿客观上将导致优势互补。第二，科学实证的学术化专门化倾向

决不会导致脱离现实，相反，只有追求独立的学术价值，才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生活，为社会提供准确的指导分析。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在半个世纪前的《江村经济》一书序言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这种常识性判断的价值和影响，将远远超过那些导致社会痉挛的轰动效应理论。

该是结束自欺欺人的“文化研究”的时候了！五四新文化追求先进文明的精神永存，而五四新文化的学术眼光必须改变。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刘斯翰

書海酌蠡



僧叡生卒年考

斯翰

僧叡，北朝著名佛学家。鸠摩罗什八名入室弟子之一，与道融、僧肇、道生齐名，世称“关中四子”。由于《高僧传》载录语焉不详，他的生卒年迄未确定。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未作考订，石峻等主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统称生卒年不详。唯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作了研究，云：

《高僧传》对僧叡的评价很高，但传记却写得语焉不详。从僧叡自己写的《喻疑》推算，他可能卒于法显译出的《大般泥洹经》（417年）之后，昙无讣译出的《大般涅槃经》（421年）之前。僧传说他活了六十七岁，那么他的生年当在351—355年之间。

任书辨出原题慧叡所著的《喻疑》应为僧叡所著，并从中考求僧叡的生卒年，诚读书有得。但我以为，其实就在僧叡确定无疑的文章中，有着更确凿的证据，可由之更准确地考知他的生卒年。在世存僧叡著《大品经序》（见《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中，记述了鸠摩罗什“以弘始三年，岁次星纪，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事，后云：“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下文更叙述“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等情事。这里，僧叡自言弘始三年时他恰当“知命之年”，即50岁。这是一个十分明确的记录，“既知命”者，是年正满50岁之谓也。弘始乃后秦年号，弘始三年为公元401年，由此上推，则可知僧叡生年为349年，相当于东晋永和五年，因其67岁卒，又可知卒年为418年，即后秦亡后一年。

五四·新儒学·人的现代化

单世联

一旦确立了新儒学和五四的潜在联系，20世纪中国思想在折衷中偏向传统的实质也就相当清楚了，从而在批判传统和引进西方两方面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一、没有五四就没有新儒学

五四的主题是历史的产物。激愤于“天朝大国”面对列强的欺侮竟然不堪一击，毫无招架之功的耻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以拯救祖国的艰难历程，以儒家礼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被逐渐明确为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言技”到七八十年代的“言政”再到九十年代的“言教”，表明在西方文化步步紧逼面前，中国人的自我反省已从技术装备的文化表层经过社会制度进入到作为文化内核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观点和见解在前此的数十年中已经露面，但五四却以两个极其鲜明的特点使中西之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第一是它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和根本否定，以为“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陈独秀），延续数千年，曾有过繁盛往昔的传统文化到了非彻底改变不能救中国的地步，这是自

强运动和戊戌变法所没有清醒认识到的。四十年代毛泽东赞扬五四“不妥协”的精神，当代学者称之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都抓住了五四毫不留情地与传统自觉对立的基本立场。第二是它畅开国门拥抱西方文化的宏伟胆识和阔大气魄。五四先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推动中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方案，从柏拉图到杜威的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被源源不断地介绍进来，使中国思想史进入一个可以和先秦战国比美的空前活跃的时期，西方成为五四时期最有特征的口号。这在一向讲究中庸之道、重视文化延续的中国，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巨大震撼，即使是后来肯定五四精神的，也批评它对传统文化缺乏分析、一概打倒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于随后不久的东方文化派和本位文化派，则更是对五四“割断”历史耿耿于怀，深致不满。

然而，恰恰是五四从整体上提出了传

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的课题，架构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伟大桥梁，为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带来了亮色和转机，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五四，那“盘根错节，豺据泉视，始终顽强地挺立着”的传统文化（王元化）会怎样无可挽回地腐烂下去并悄无声息地毒化着四万万同胞。五四不但迎来了崭新的西方文化，也激活了一部分中国人重新探索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涵和终极关怀。新儒学尽管以五四的反动而出现，却是以五四为历史前提和思想参照的，在经历了第一代（梁漱溟、熊十力等）和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等，贺麟似可除外）比较激烈的批评之后，第三代新儒学即当代新儒学已经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五四运动：“西方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进行学术文化批判，其结果对孔孟之道的精义不无厘清的积极作用，相反地，企图利用先圣先贤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军阀政客，不仅没有达到推行孔教的目标，反而把儒家的象征符号污染了”（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般地说，当代新儒学的倡导者对五四先驱都抱有相当的敬意和同情。

具体地说，五四和新儒学的关系展开为：一、五四把文化问题视为解决中国危机的根本，以否定的形式提出了传统对现代中国命运的影响，给新儒学重新阐发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的思想范式，梁漱溟即说过“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文化讨论被赋予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术研究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成为贯穿五四和新儒学的基本特征。二、五四猛烈揭发传统文化的痼疾及其对现代化运动

的阻滞，把近代以来一切企图以传统抗拒变革的阴谋政治和保守思想视为民族的罪人，逼使新儒学另辟蹊径，重新阐释传统儒学的真面目和真意义，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三、五四否定传统和新儒学肯定传统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巨大张力，吸引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思考传统问题，新儒学由此获得不断深化，完善自己学说的动力，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有力一环。完全可以说，没有五四，就没有新儒学。

二、在西化和现代化之间

当代新儒学分享了五四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热望，基于现代中国七十年来坎坷曲折的道路，基于西方现代化的困境以及后现代社会对某些前现代文化的眷恋，他们“置身于目前全球各地都出现了整合与分裂两种冲突乃至矛盾现象相互影响，互相转化的情境中，来考虑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要紧问题”（杜维明），区分西化和现代化是新儒学重评五四复兴儒学的出发点。

对儒学传统的现代开掘，有着极为广泛的文化背景。现代人类学已经抛弃了“单线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论”，确认各种文化形态的合理性和独立价值，建立了一系列文化相对性和文化发展多元论的理论系统，而且，当代比较现代化的研究表明，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过程和特定阶段，不同传统的国家地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实现，已有学者在探讨“西方式的现代化究竟在当代是否尚有前途”的问题，并指明中国传统走向现代的可能性。因此，余英时认为：“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

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现代化,即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必须继续发掘自己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相反,如果“对民族心理结构缺乏分析,对其价值系统缺乏认识,即不能把富国强民之道建筑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这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必枯亡殆尽”(杜维明)。

应当指出,区分西化和现代化的看法,在三十年代已经明确,所以冯友兰在四十年代初指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当代新儒学的成就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汇通的背景下,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可能贡献,在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际主动“认同”,追求“共识”,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获得了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语言结构。

这在学理上差不多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五四先驱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却并非只是误解,甚至也不只是策略上的考虑。近代中国是在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它一开始就在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列强的枪炮威胁下,而传统思想确乎在近现代中国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现代中国不可能象文艺复兴那样通过复古进入现代化,西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六十年代以来,新儒学以东亚四小龙为例指出传统可以和现代化并行不悖。但我们更应当注意的是,差不多所有这些国家地区都是凭借与西方的特殊关系,广泛引进西方文化而进入现代化的。

构成其现代化本质的,恰恰是传统所没有的,明治维新的最初萌动是在长州这些远离皇权中心的僻远地区的事实,也可说明这一点。至于说传统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些地方并未消失,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某种遗憾,并不是没有疑义的,比如政治民主在这些地方就不很健全,有人说日本现代化“是一种长达三个世纪的延续性的无痛苦死亡。”(摩尔)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说传统儒学可以促进现代化,即使承认传统与现代化并非水火不相容也无济于事。对于历史久迈包袱沉重的中国来说,首先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动因和催化剂,是使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焕发青春的生机和活力,传统仅仅和现代化不矛盾,可以相安无事还远远不够,如果它不具有现代化的导向,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那么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要求批判传统,否定传统,就不但是进步的需要,也是逻辑的必然了。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一些西方学人对中国传统的礼赞呢?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大部身居海外及港台地区,他们深切地感到现代社会中日趋严重的人性异化和精神危机,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本意之一就是试图避免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和麻烦,以人文规范科学,以和谐弛缓对立,他们未雨绸缪的民族责任心是极其可贵的。问题是:第一,对西方现代化产生的弊端,西方文化自身也在设法解决,弗洛姆指出:早在十九世纪,“瑞士的保守主义者布克哈特,俄国的宗教激进分子托尔斯泰,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和保守主义者波德莱尔,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梭罗和后来的关心政治的杰克·伦敦,德

国的革命家马克思——都极其严厉地批判了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健全的社会》), 二十世纪更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声, 并有各种医治方案和实践, 也获得一定成效, 当代发达国家早已不是狄更斯或巴尔扎克所描写的模样了。说到底, 真正能够诊治现代化疾病的还是现代化了的西方文化, “紫气东来”——用中国传统拯救西方只是一种幻想。第二,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给西方文化的自我调整以一定启示, 但却不一定能对中国现代化发生有益的促进, 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和现实环境来谈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 不过是虚幻的自我肯定。既然在西方传统中产生的现代化有如许问题, 我们又怎能保证按照中国传统的循环演变会是通体光洁万无一失呢? 西方传统导向西方现代化, 中国传统迄今仍在羁绊着我们, 那么身处现代的我们, 自觉地与传统决裂, 主动地向现代化了的西方学习, 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现代化不是西化, 但现在的西方已经现代化了, 在现代西方世界, 并没有一个与现代化无关的西方文化, 要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抽象出一个纯粹的现代化, 那是不可能的。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 也就是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 按照我的理解, 它逻辑地包含两个问题, 其一是以什么为依据和标准来革除、清理儒学中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部分, 其二是如何使儒学获得现代生命, 而这都必须借助西方文化来进行。杜维明说近代以来儒学经历了从文法到辞汇的降格, 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中国已日渐由辞汇向文法冉冉上升。难道因为传统还存留、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 就非得发掘、张扬, 并以之来

消解现代文化吗? 回答是否定的。

三、今天的思考

五四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 把现代化理解为思想文化的启蒙, “伦理的觉悟,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五四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主要是观念层次上的文化启蒙, 但这一伟大的历史工程不久就让道给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而被搁置起来, 五四的实际成就只是打碎偶像、冲破罗网, 但建设性的成就却不多, 所以鲁迅在“呐喊”前行之后曾感到深深的“彷徨”苦闷, 可以想象当他说《呐喊》和《彷徨》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时心情是何等的寂寞。对处在方生方死之际的中国, 五四先驱们是回天乏力的。在现代化的要求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重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再次估价传统文化的呼声便从各方面传出, 五光十色的西方思潮又一次扑面而来, “文化”、“批判”、“现代化”、“西化”的字眼充斥着我们的印刷品……情形颇类70年前, 因为五四的任务并未完成。

尽管五四以来有过激烈的西化派和本位派之争, 但真正的全盘西化派只是极个别的。因为事实很明显, 中国人不可能全盘西化。梁漱溟干脆挑明,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方。相反, 中国传统却一再表现出它的巨大惯性, 五四还未结束, 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就转眼之间在一些人的书中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粉墨登场。到1985年讨论中国文化的出路时, 西化的概念已被现代化替换, 西化思潮明显退却。建国后, 一面是大陆终止了现代化的讨论, 另一面是港台及海外的新儒学以

全新的理论结构和广阔的人文视野深入地弘扬传统。纵观七十年的文化争论，西化只是少数人的激进思想，体现了深受传统之苦而渴望走出泥潭的一种理想、一种憧憬，大体上是一种情绪性的追求意向。而一旦回到现实，全盘西化不仅根本办不到，理论上也说不通。从而虽然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各种负面感受甚深，却终难超越和摆脱，与理论上不断责难各种调和论、本位论相反，现代中国实际上走着折衷的道路，并常常倾向传统。在一次次对全盘西化的鞭挞中，我们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以至它甚至戴上马克思主义的漂亮面纱畅通无阻。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并不比五四时期乐观多少，构成我们民族生存主要威胁的，已不是外国入侵而是内部危机。这一点，中国问题专家何博传在他的《山坳上的中国》中，从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能源短缺、交通紧张、生态破坏、粮食不足、管理落后、经济运转的障碍，人口素质的低下以及教育危机、科技滞延、人才浪费，和知识分子的悲哀等方面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处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还没有完成近代化的任务，贫困和落后使得我们还不能真正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地和西方对话，引进和学习成为我们对待西方的心态特征，作家刘心武非常诚挚地说过，不管我们个人的价值如何，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上不发达和平均教育水平低下的大背景下，在西方人眼里总是别样的。洋教授对中国传统的几句不负责任的颂扬丝毫也不能减轻我们现实的重负和自愧。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对此感奋？从而，我们现在应当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

业，特别着眼于批判那些依然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活的传统。鲁迅说过：“此后最紧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仍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所谓国民性就是在传统文化的浸淫熏陶下的现实人格系统，这应当是我们文化批判的重心，传统只有在阻碍我们今天变革，干扰我们走向未来的意义上才成为我们一再提及的话题。而现代化，就狭义的文化领域而言，就是人的现代化。近年来文化讨论的两个致命弱点在于：一是局限于知识层，没有动员起全民族共同参与，没有充分实现文化批判的应有的现实效应；二是具有浓厚的学院气，热衷于儒道庄禅，程朱陆王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把文化讨论狭隘化为知识论上的功夫，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现实社会的解剖结合起来，才能使文化讨论获得一个真正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动力，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运动。如果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即通过发展经济、变革制度完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那么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文化（狭义）现代化不过是全面现代化运动的起点和开始，而这又是花了七十年也没有解决好的。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更感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确实是任重道远而事艰业巨。

作者单位：中国剧协广东分会
责任编辑：刘斯翰

唯真诚可以永恒

——聘如·新作《永恒》序

峻 青

时值阳春，聘如诗集出版在即，邀我代序，诚是十分高兴的事。读者能有机会了解一下这位漫游四海、观察敏锐、思索深刻、感情真挚的诗人的作品，将会很有裨益。

聘如曾是位职业记者，也是一位很有才华和艺术个性的诗人。诗人难当，尤其以诗为魂的诗人更不多见。诗为心声，不可掺假，不可以为靠拼凑一些美丽的词句便能成诗。聘如是位自幼爱诗并以诗为魂的真正诗人。他的《在突尼斯语言学院答学生问》作为对话录在海外享有甚大的影响，在这篇蕴含着人生哲理，闪烁着智慧火花的《问答录》中，诗人那种对人生、对信念、对理想和对社会责任感的灼见及追求，感人至深。他的直抒胸臆体现了作者非凡的爱心，正直独立的人格，他的诗无疑是和作者在对话录中所阐明的立场紧密相连的。诗人在对诗的追求中不断发现新的事物，诗人爱人，歌咏人生之美；他反对将个性与标新立异划一，并同时将自己严肃的独立思考建立在对诗和为人的真诚之上。诗人将自己比拟为“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一个两头点燃的蜡烛”。可见他在纷繁

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多么真诚和值得信赖和赞赏的人。读聘如诗如见其人，诗人在生活中洁身自好并以崇高的爱心建立自己的诗歌。诗人对生活所作的充满哲学意味的探索的总结，也总是那么热切而准确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中国人历来认为诗品和人品之不可分，聘如应是两皆具备的。

诗人与诗较之小说家与小说，更接近于音乐家之于音乐。在所有重要环节上，我指的是创作过程中，诗人更需要激情和完美的表达。聘如的诗豁达明朗，有时又委婉若倾诉，处处流露出诗人那种天然绝俗的情致，正如一首好的音乐，能与大众共歌。

和一切有造诣的诗歌那样，聘如的诗也有自己的源流。所谓源者，乃是指诗人所处的环境对形成其创意的影响，流则是指作品对传统的继承性。我们读聘如的诗，那充满异国情调和思乡的歌声，那曼吟于四海的韵步，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多姿多彩的浪漫感受，而那质朴典雅的诗句，则作为一种真正精神的体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顺乎其然地讨论一下关

于诗及其形式的问题，聘如的诗未始不可为我们提供一点有益的佐证。

纯朴、天真、自然、深沉。这八个字既可归纳为聘如诗的特点，似乎亦可算是一个诗的有待追求的宗旨。近年来，文艺开放，海外一些“新”诗歌陆续被介绍到国内，给人以色彩纷呈的感觉。我涉猎了一些作品，好坏难加评论，但就个人感受来谈，一些繁复、冗长的辞句，一些复杂互悖的意象，再加上刻意标榜的形式以及表意不清的语言，似乎正以其含糊不清乃至成了时尚，国内的有些青年，出于爱诗的目的，也大有仿效之作。我想作为一个认真的读者，有时表明一种观点，大约算不上被认作落伍者；说到底，在面对诗的精神和其真正的意义时，有人难免茫然。

其实所谓新诗歌也好，中国的古诗也好，真正优秀的作品没有一首不是以其有所创新而传世的，在这个意义上，诗自然应该是新的，而且是崭新的。倘若仅仅认为一种古怪到闻所未闻的形式，一种模糊到不知所云的意念，一种轻薄到游戏的创作态度，便是新诗的特点，那未免太幼稚了。事实上，很有这样的诗作招徕读者，仿佛诗的妙意全在使读者进入昏睡和催眠状态，方才能体现作者的智力和才具。一首好诗，必须要求它每一个描述都是为了要在读者心中产生诗人所要求产生的那种感情，一句话，一个短句。诗人心诚，读者心诚，诗由是而成。大诗人希门尼斯认为诗人是一种媒介，与绝对事物沟通，并能理解绝对事物，同时又认为诗是对内在不可表达之物（心灵）的表达，是很有道理的。所谓绝对事物，指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的脉动，诗人把握它，并且

能认清它，将之传递给读者；诗人所用的方式倘若又是表意不清的，那么他所处的具有整体高度的诗人的立场则将不复存有。

聘如的诗亲切流畅，颇切合中国人的返朴归真的说法。返朴归真是个非常辩证的观点，我想脱胎于自然天成和斧凿雕饰的艺术在风格和内在精神上都是迥异的，返朴归真具有经历了某种过程之后重新回到起始点的暗示，它表明这新的起始点乃是步入新境界的入口。

读聘如的诗深为其浑然天成的韵味所感染，作者十分自然地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意境淡泊而幽远，娓娓道来，不事铺陈。“情到浓时情转薄”，诗人风格如此，交友处世亦相仿佛，深沉而不思炫露，严谨不失洒脱，殷殷如血，赤子之心何触。

聘如的这本诗集取名为《永恒》，我是深切理解它的内涵和意义的。这正如他在赠送给我的《突尼斯啊，我爱你》一书中扉页上的题词：

我总相信：唯真诚可以永恒
这蕴含着深邃哲理和人生经验的题词，正是聘如在人生路程和艺术路程上所始终如一追求和体现的。

聘如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为人是真诚的，他的诗，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人生哲理的《问答录》也是真诚的。唯其真诚，他的为人，他的作品，才有如此撼动人心的力量，才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唯其真诚，才能重视、尊崇别人的真诚。他曾对我说过：他非常喜爱巴金的《随想录》，因为它是真诚的。他曾这样想过：假如不幸家里起了火，那么他室内的

一切珍贵的东西，都可以置之不顾，但却一定要把这《随想录》抢救出来。

这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和艺术夸张，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再重复一句：只有自己是真诚的人，才能如此高度珍视和尊崇他人的真诚。也正因此，在聘如看来，真诚是无比宝贵的，因而，真诚也是永恒的。

有着如此一颗淳朴的真诚的心，再加上从长期记者生涯中所获得的异常丰富的

人生阅历和敏锐观察、深沉思考，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聘如一定还会有更多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和充满着淳朴真诚的情感的好作品，奉献给读者。

我祝愿，我期望。

·解聘如，著名记者、诗人及学者，著述颇丰，其新诗集《永恒》即由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北京分会

责任编辑：石成



子贡“文犹质、质犹文”说商兑

周凤章

《论语·颜渊》中记录了子贡与卫大夫棘子成关于文质关系的一次论辩：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

孔安国解“文犹质也”等四句为：“皮去毛曰鞞，虎豹与犬羊别，正以毛文异耳。今使文质同者，何以别虎豹与犬羊邪？”（转引自《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2503页）后人多本孔说，迄未见异议者。然而，我认为关于子贡这段话的理解，尚有可商榷之余地。

问题的关键在于“文犹质也，质犹文也”究竟是谁的观点。

按照孔安国说，似乎这是棘子成的观点，被子贡加以转述作为批驳的靶子的。我以为非是。因为棘子成讲得很清楚：“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他认为有质即可，或有质无文亦可，或文与质两不相涉，他显然是文、质割裂论者；而按孔安国及后人的说法，被子贡转述的棘子成的观点，一下子变为“今使文质同”，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文质不可分割论者了。

我认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是子贡所持之论点，更确切地说，是子贡援引乃师孔子的观点。《雍也》中，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认为文和质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可分割的，虽然有时会出现二者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子贡听到棘子成与老师取相反的观点时，自然要予以批驳，坚持老师的观点，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是先立己论，二句互文足义，意谓文质不可分。因为这道理比较深奥，所以接着用比喻晓喻对方，“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是运用“归谬法”对棘子成的直接批驳。其意盖指：虎豹与犬羊之别，不仅在于质，而且在于毛，君子与小人之别亦复如是，不仅在于内在的品质，而且在于外在的文饰，你却认为无须文饰，文质可分，今依你说，令虎豹、犬羊各去其毛，君子、小人各去其文饰，使之有质而无文，则谁复能辨虎豹与犬羊、君子与小人呢。

自黄侃、范文澜始，今之论者多以《文心雕龙》之“道”为“自然之道”，恐怕有误。刘勰不见得有什么“自然之道”的观念，但他强调“自然”的文学观，这是汉代儒者扬雄王充思想的继承，与老庄大不相同。

刘勰自然观试论

——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

曹础基

“自然”，在《文心雕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几乎是评论家们所一致承认的。“自然”究竟意味着什么？论者在谈到《文心雕龙》中的“自然”或“道”时，总是把两者连在一起，称之为“自然之道”。似乎刘勰所说的“自然”就是“自然之道”，所说的“道”也是“自然之道”。不错，《文心雕龙》中说过“自然之道”。原文是：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

整部《文心雕龙》9处用了“自然”一词，42处使用了“道”字，唯独这个地方把“自然”与“道”连在一起，称之为“自然之道”。但今之论者，一谈到《文心雕龙》之“道”，几乎都称“自然之道”。全书第一篇题为“原道”，《序志》篇又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既然所原所本之道是“自然之道”，那么“自然之道”在《文心雕龙》中当然就头等重要了。于是大家进一步探讨“自然之道”的深刻含义。对此，牟世金先生曾作过如下概括：

自范注取黄侃《礼记》之说而提出：“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亦即《宗经》篇所谓恒久之至道。”其后从此说者甚多。虽然如此，各家对“自然之道”的理解仍有很大分歧。举其要

者，如郭绍虞先生认为：“《原道》篇所说的道，是指自然之道，所以说‘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宗经》篇所说的道，是指儒家之道，所以说：‘经者也，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就不是自然之道，……《文心雕龙》之所谓道，不妨有此二种意义”，陆侃如先生认为：“自然是客观事物，道是原则或规律，自然之道就是客观事物的原则或规律。”杨明照先生认为：“刘勰所原之道，则为自然之‘道’。”并谓此道“属于儒家之道”。……其后取“自然之道”说而迥异于三家者唯赵仲邑先生：“所谓‘道’就是‘自然之道’，就是先物质而存在的绝对观念。”（毕万忱、李森著《文心雕龙论稿》序）

此外，还有认为刘勰的“自然之道”即“佛教所说的因缘，或者说是一切有为法生起所经由或所依循的自然的道路、道理、关系，或法则，也正是《无量清静平等觉经》或《阿弥陀经》中佛教所说的‘自然之道’。”（石垒《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论集》3页）这些探索，对我们深入理解《文心雕龙》，无疑都作出了贡献。但是，根据书中实际，我们是否要怀疑一下似乎已经公认的说法？“自然之道”如此重要，为什么全书只有一个地方说到？

其他谈到“道”的地方，何以就不再称之为“自然之道”呢？刘勰说的“道”究竟是不是“自然之道”？

书中唯一的一处“自然之道”，现行几个影响较大的译本都译作“自然的道理”。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说刘氏“把这一文学产生过程叫做‘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译作“自然的道理”，或理解为自然而然的的过程，本来是再顺当不过了。但把我们现代汉语的“自然的道理”称之为“自然之道”恐怕就有出入了。“自然之道”是个比较凝固的结构，中心在“道”；“自然的道理”形式上中心词也在“道理”上，但意义中心在“自然”。所以《原道》篇下文又说“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而省去了不关重要的“道”字。用“盖自然耳”替代上文“自然之道也”，意思完全是一样的。两句不同，只是行文的变化。“原道”之“道”是指“道之文也”之“道”，亦即“神理”，而非“自然之道”之“道”。不少研究者在翻译时译作“自然的道理”，而在写论文时又称之为“自然之道”，继而又在“自然之道”上做文章，我总感到把问题复杂化了。

这种复杂化的过程，首先是刘勰。如果他把“自然之道”写作“自然之理”，问题大概就不存在了。他说的意思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一过程是非常自然的，是合乎常理的。把这一意思说成“自然之道”，恰巧篇名又叫“原道”，那么读者自然就会理解为所原之道即“自然之道”了。其次是后代读者阐释中的逐渐增益。清人纪晓岚谓刘勰“标自然为宗”，最早突出其“自然”之义，但仅仅指自然。这个“自然”，是与“外饰”相对的一种状态、风貌，而非“自然之道”。纪晓岚这个评语，按中华书局1957年8月版《文心雕龙辑注》是点在“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一处的，而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释》却标在“自然之道也”一处。这样的移位，“自然”所指的对象就不同，前者指文的风貌，后者指文产生的状态、过程。而且后者加重了“标自然为宗”即“标自然之道为宗”的错觉。当然这种错觉不是这处移位引起的。继纪评之后，黄侃的《札记》则曰：“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黄氏虽然没有把“自然”与“道”连成“自然之道”，但他说“所谓道者，如此而已”的“如此”确指“自然”。而到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即接引黄氏之意明确提出：“所谓道

者，即自然之道，亦即《宗经》篇所谓恒久之道。”从此以后，刘勰所原之道就成了“自然之道”了。

刘勰不见得有什么“自然之道”的观念，但他强调“自然”的文学观倒是事实。概括起来，表现在下列几点：

1. 文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天地、日月、山川、旁及万物，动植皆文。这些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无识之物自然成文、作为有心之器的人类，亦“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见《原道》）

2. 文学的创作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蔡邕的碑文写得好，“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隶碑》）

3. 要写出胜篇秀句，得靠作家的情思与外境的自然融合。所谓“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隐秀》）

4. 文章的风格也是文章的体裁上的要求与作家的习染自然趋向形成的。（见《定势》）

5. 就是骈体的形式也是自然形成的。（见《丽辞》）

除了明确地指出“自然”之外，书中还有不少地方表述了崇尚自然的倾向。如《物色》篇说：“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纪晓岚评：“四序纷回四语尤精，凡流传佳句，都是有意无意之中偶然得一二语，都无累牍连篇苦心力造之事。”王元化先生亦谓“《养气篇》：‘常弄闲于才锋。’《物色篇》：‘入兴贵闲。’《杂文篇》：‘息闲可瞻。’这里所拈出的‘闲’字，……都是用来表示文学创作的天然性。”（《文心雕龙创作论》附录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还有《神思》篇：“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澹五藏，澡雪精神。”纪评：“意在游心虚静，则腴理自解，兴象自生，所谓自然之文也。”

由上可见，刘勰的《文心雕龙》的确是以自然为宗来论述创作，评价文章的。他提倡自然的文风，反对过分的雕琢，甚至在创作上提出了如何表现得自然的一些可贵的见解。

提起“自然”二字，人们都会联想到老庄，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先提出“自然”这一概念的是《老子》一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司马迁谓其“要亦归之自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宋林希逸说《庄子》一书“翻来复去，只

说一个自然之理”；明陆西星更谓其“篇篇皆以自然为宗。”

同样“以自然为宗”的《文心雕龙》与《庄子》，很容易使人想到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这已多见于时贤的有关论述。本文主要侧重于说明它们两者之不同：

一是两者所属的层次不同。《庄子》的“自然”属哲学的层次，是真正的所谓“自然之道”。老子说“道法自然”，表明道的性质是自然的。庄子没有说过“自然之道”，但他说“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对道的自然性质作了具体而清晰的表述。刘勰的“自然”属文学的层次（已见上）。庄子之“自然”在于纠正人性之扭曲；刘勰之“自然”在于纠正文风之雕刻艳藻。哲学的层次可以运用于政治、人生，亦适合于文化艺术，故涉及文艺思想时，两者可以相通。刘氏多引庄语，亦非全无巴鼻，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二是两者的性质不同。庄子之“自然”是无为之自然，朴素之自然。刘勰之“自然”是有为之自然，文明发展之自然。根据《原道》所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一直到六经，是人文的自然发展。《辨骚》谓屈原之作能“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亦属自然。后来“楚艳汉侈，流弊不已”，才失真而不自然。《丽辞》甚至说：“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骈文偶句亦出于“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是为文之自然。总之，圣也、经也、仁也、孝也、奇也、丽也，都可以归入自然的发展，而且也应该合乎自然的发展。并非如某些论者所批评的那样，刘勰把客观存在的自然之文与人的创作的人文相混。刘氏是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都看作是自然的。

这种自然观与庄子的自然观是格格不入的。庄子认为唐虞之后，则“兴治化之流，巢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相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因而主张“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灭文章，散五采”。（《肤篋》）在他看来，尧、舜、文、武等圣人“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孔子是个“矫言伪行”、“作言造语”之徒（《盗跖》），因而要绝圣弃智。

三是刘勰谈自然突出个性，庄子谈自然强调

混同。《明诗》中说明诗的各种风格：雅、润、清、丽等，“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是不相排斥的。文学创作各有个性是文学发展的表现，它是合乎自然的。因为人的个性不同，“各师其心，其异如面”（《体性》）；人的情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反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五性发而为辞，神理之教也”（《情采》）。而庄子正是反对人们“随其成心而师之”，造成“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他又认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德充符》）。七情五性的发泄，不但不是自然的，而且是人为的自我损害。所以他提倡的是与物混同，磅礴万物以为一，置心于冥冥之中。凡是突出个体的能动作用的都是自然状态的破坏。

可见同以自然为宗的《庄子》与《文心雕龙》，在同样使用“自然”的概念的情况下，实际意义相去甚远。无为的自然，要求人们返归自然，人类融化于自然，与自然界为一体；有为的自然，即追求文明的发展，追求人类拔萃于天地之中。

儒家孔孟，从不谈“自然”，而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也”，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荀子采用了老庄的“自然”观念，但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性恶》篇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在使用老庄“自然”一词的含义上，荀子是准确的，把“待事而后然”看作是不自然的，是伪的。但他不以自然为尚，而是强调人为、学习。孔孟不谈自然，荀子崇伪而轻自然，则所谓刘勰之“自然之道”有取于荀子，归属于儒家云云，恐与事实大相逕庭。

法家韩非亦从老子中接过了“自然”的观念，以为其法治立论。他在《功名》篇中说：

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疾；得势位，则不推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会，故曰明主。这大概是先秦著作中最早出现的“自然之道”。韩非认为可以行自然之道，能够“守成理，因自然”（《大体》）而取得国家大治是最理想的境界。但是，“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

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难势》）可见，韩非并不一味地主张自然。自然之势能为我用则用，不能为我用则须“人之所设”。“自然之道”在他心目中是与统治术紧密相连的。真正的“自然之道”在韩非心目中是微乎其微的。

真正继承了老庄的自然观或者“自然之道”，而又把它从无为之自然转化为有为之自然的应该说是《淮南子》的作者。《原道》中说：“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与老庄相去不远。但他强调自然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干，《修务训》说：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

无为与有为不是对立的，可以结合、统一。他还从事业必须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泰族训》）

说明无为而不求发展也是不自然的。诗、乐等文艺的产生亦属自然之事：

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大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道；有喜乐之生，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

《淮南子》作者完成了从无为自然向有为之自然的转变。扬雄、王充都继承这一观点。扬雄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譬诸身，增则贲，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其可损益欤？”（《太玄·玄莹》）王充写了《自然》篇，以天道自然说抨击汉儒的神学，但他

也是把自然与有为相结合的，他说：“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王充、扬雄在谈到“自然”的时候，都声称有取于道家之言。又证明“自然之道”与儒家实不相干。

刘勰的自然观，正是汉代儒者思想的继承。如果只是无为的自然，只能有自然界之文。人类之文、人心之文，要产生，要发展，要多彩，都必需有为。有为而又强调自然，主要是针对文风之时弊，反对过分的雕琢浮华而已。这与王充之疾虚妄反华文是一脉相承的。

纯粹的无为自然，事业不能发展，文明不能进步，甚至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但有为之自然，是否就完全合理呢？晋代玄学家王弼在《老子注》第二十二章中有精辟的阐述：

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故曰惑也。少则得其本，故曰得也。

王氏所云，以树为喻。树生长得愈多愈快，则枝叶愈长愈离开根本。这犹有为之自然。长得愈少愈慢，则枝叶短小，愈靠近根本。这犹无为之自然。近根本则得真性；离根本愈远则愈失其真而惑。

按庄子之自然，能更好地体现人的本性，但不能发挥人的潜能。以之指导文学创作，会着重表现人性之深层、人的本我、人的潜意识，揭露人性在社会发展中的扭曲，其失在缺乏崇高。以刘勰的自然观指导文学创作，会着重表现人性之高层、人性的自我追求、人的潜能的发挥，亦揭露文学创作中的过分造作，其失在掩盖了自然中之不自然，即王充所说之“惑”。周振甫先生批评他：“用‘自然成对’来说明骈文的出于自然，是用个别代替一般，并不确切。”（《文心雕龙注释·丽辞》）这正是掩盖不自然之一例。

作者单位 华南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 刘斯翰

谈敦煌石窟中的俄尼沙(Ganesa)

(香港) 饶宗颐

敦煌莫高窟共490余窟，只有列285号的西魏大统四、五年禅窟中的壁画，绘著象头人身的俄尼沙(Ganesa)，位于大自在天的下面。窟中这样的像从来只出现一次，以后便消失了。闻说榆林窟亦有一幅，惜未获睹。俄尼沙在印度教的神话里，地位甚高，他是代表智慧和学问之神。(god of wisdom)又是淫婆(siva)与婆罗和底(Paravati)的儿子，从古事纪(Puranas)时代以来即受到崇高的歌颂；何以敦煌石窟只有一见？我在瞻拜该窟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回旋在脑海中，久未解决。

俄尼沙亦为障碍之神(god of Obstacle)，他能制造障碍，同时亦能消除障碍，故常被作为祈求的对象。印度习俗，在一切事业开始的时候，人们每每念下面的词句：

namo ganesāya vighnesuaraya

意思谓：归命俄尼沙神，是一切障碍的克服者。好像我国人念南无(namo)观世音菩萨。印人在书籍的卷端，时亦写着这一句话，故Vighnesvara亦成为俄尼沙的别名。

汉译佛典俄尼沙通常有二名：一是毗那夜迦天，亦称裨那夜伽，梵语Vināyaka，一是迦那钵底，亦作俄那簸底，梵语Ga-

napati. Ganapati之名远出自黎俱吠陀 I 23.1，其文云：

gananām tva ganapatim havāma-
he havim havinam. upa masravasta
man. (Rig-veda, 德国Aufrecht本第一册页195)

意思是：祝汝迦那钵底，众神之首，圣中之圣，荣盛丰足无尽。法国梵学者兴努(L. Renou)举出祭规法典(Yajñ-avaikya-dharma śāstra)中一句云：

Viniyojitah ganānām adhipatye
ca rudrena

意思是：群神受命，为真宰(rudra)所倚界。他认为此处的迦那(gana)即，相当于俄尼沙。gana一字的意思是团体群、随从；钵底(pati)是主，因为他是大自在天(siva)的随从。俄尼沙的异名，见于朵俱吠陀中又有dantih，取其象牙为义，hastin和Vakratumda则状其象身，已详兴努的讨论。

唐代密宗传入之后，毗那夜迦天乃有双身，取譬于权、实合一；因之，后有大圣欢喜天之称。有关毗那夜迦的译著，唐时菩提留支，金刚智、善无畏、不空、舍光、憬瑟、般若惹羯罗及宋代法贤等都有不同的译本，见于大正藏1266号至1275号，计得十种之多，资料甚为丰富。

金刚智译的《佛说金色迦那钵底陀罗尼经》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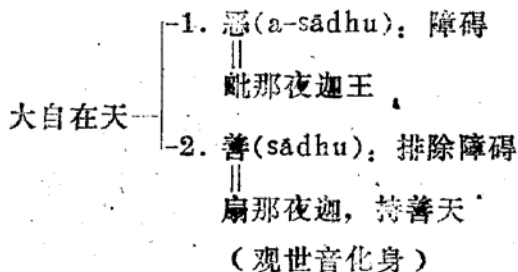
佛告舍利弗，此是金色迦那钵底除障难真言。

其像形人身象头六臂，于白氈上画之（《大正》21、页303）

善无畏译的《大圣欢喜双身大自在天毗那夜伽王归依念诵供养法》说：

大圣自在天是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王，乌摩女为妇，所生有三千子，其左右千五百，毗那夜伽王为第一，行诸恶事，领十万七千诸毗那夜伽类；右千五百，为扇那夜伽持善天为第一，修一切善利，领十七万八子，诸福伎善持众，此扇那夜伽王则观音之化身也。……夫妇令相抱立之。身去五寸，象头人身。（《大正》册21，页308）

这可证明毗那夜伽是大自在天的儿子，同时亦为障碍之神。试表如下



密宗的书，把大自在天的儿子，划分为善、恶二系，不像印度本土的俄尼沙，一身可具有生障、排障同样正反的作用。毗那夜伽既是障碍神，代表恶的一面，遂被编入恶鬼的行列。传入日本东密胎藏界中的七日作坛法，其方形坛内，正是要使恶神毗那夜伽退散，因而使用许多咒语和法事。我们看唐阿地瞿多译的《佛说陀罗尼集经》卷四内七日供养坛法云：

在此院内，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

一切破坏正法毗那夜伽恶神鬼等皆出去我结界之所七里之外。……

若护正法善神鬼等……次第依彼军荼利法辟除结界……（《大正》册18页813、814）

结界以排除恶神。其护正法的善神，即指持善天之扇那夜伽等。上引陀罗尼集经卷十一举出有下列各咒：

一切毗那夜伽法印咒（列第四十九）

毗那夜伽咒法（列第五十）

调和毗那夜伽法印咒（第五十）

说云：“欲作此法，先须造像。……夫妇二身令相抱立，各长五寸，七寸，亦得二身，并作象头人身。”这时已施行双身的欢喜天像法。

印度婆罗门散佚经典，其中有Vināyaka-śānti者即毗那夜伽（镇静）法，其书收入于Bata-Kaishne Ghosa所编的Collection of the fragments of lost Brahmanas（婆罗门散策辑佚）1935加尔各答印行，日本辻直四郎著“吠陀学论集”有文介绍大意（页49），故知毗那夜伽法远源出自婆罗门外道。

在憬瑟撰集的《大圣欢喜双身毗那夜伽天形像品仪轨》及般若惹羯罗撰的《圣欢喜天式法》各书，对于双身的象头人身的毗那夜伽男、女天合抱的形状，有详细描述，憬瑟是依据含光口传而制出这一秘密仪轨。含光在他所著的《毗那夜伽俄那钵底瑜伽悉地品秘要》中说道：

毗那夜伽生欢喜心双身真言曰：

唵！似哩 虐 娑嚩贺

行者常诵此咒，无有障碍。是真言中显权、实义，所以者何？似哩者是观自在菩萨种子字也。菩萨现此身为其妇而劝

进，令毗那夜迦不作障碍。……次虐者是毗那夜迦种子，此常随魔也……唯时而来而作障碍，毗那夜迦常随作障碍，故名常随魔也。假使梵王及桥尸迦诸天龙等，不能破如斯障碍，唯有观世音及军荼利菩萨能除此毗那夜迦难也。（《大正》21册，页321）

据此知双身真言中似哩（nari）是观世音的种子字（bija），表示权，虐（ñā）是毗那夜迦神的种子字，表示实，双身的毗那夜迦欢喜天，男天指魔王，以喻其实，女天代表十一面观音，以喻其权，权与实两者的对立与调和的道理，含光亦有详细说明，今不赘述。密宗双身欢喜天，代表男、女天的调和，主要旨意在调伏障碍，使毗那夜迦之恶魔，化为善行，诱进诸障，令入正见。一切恶事悉皆消灭。由于身、口、意三业的懈怠，遂引起种种障碍，其真言法中有三部，代表三尊，即毗卢遮那（大日如来）、观世音与军荼利三部尊，作为礼拜对象。此为唐代密宗的仪轨，想是后来踵事增华之举，在西魏时代，尚未有双身的形状，所以285窟坐于大自在天之下的象头人身像应该是ganesa，而且大自在天位于中央，说明他是饿尼沙的主人，是时从印度传入的仪轨大致尚保留婆罗门的教绩，不像唐中叶以后密宗大师胎藏界等的旗帜分明，所以不能认为正式的密宗此时已经输入了。

至于饿尼沙此后何以消失？有二点可以说明：

- (1) 饿尼沙被目为障碍之神（如唐初玄应在《一切经音义》卷24所说：“毗那恒迦，此云有障碍神”是。）属于不利的对象，故不为人所喜欢。
- (2) 能降伏毗那夜迦天的障碍，以十一面观音为最具代表性之神，故后来双身的欢喜天取之作为女天的化身。但十一面观音画像在唐初敦煌石窟已出现（如334号窟东壁）。后来更非常普遍盛行。《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Ekadaśamukha）在北周已有耶舍崛多译出，玄奘亦译成《十一面神咒心经》（《大正》20，1070，1071号）。唐以降有十一面观音的崇拜，即可代替饿尼沙的消除障碍的神力，这样，饿尼沙亦可以扬弃了。

敦煌石窟所以饿尼沙只有一见，而十一面观音的图像则如恒河沙数。我想饿尼沙在西魏以后不再出现，上述原因，也许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是否有当，甚望方家加以指正。

1988年3月25日

敦煌石窟后期，元代亦有饿尼沙像，则由喇嘛教传入，正如蒙古铜制佛像之有不少象头人身像，情形相同，不能与此并论。又记。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责任编辑：刘斯翰

秦汉时代，中央政府对岭南实行了特殊的经济政策：“以越治越”、“越律”与“汉律”并施、“以其故俗治”、“毋赋税”……这种宽松的扶持政策成为岭南早期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秦汉岭南经济述评

洗剑民

秦汉时期是岭南经济的历史转折点，是岭南地区向封建文明过渡的历史时期，它对岭南以后的历史，甚至对全国的历史有着较深远的影响。

(一)

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岭南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岭南地处亚热带，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丰富的森林、野生植物、矿产和海产资源，为纺织、造船、冶炼及采集业提供充足的材料；濒临南海，内河纵横，带动了航运业的兴起；岭南又是通向世界的口岸。秦汉时期正处于我国对外贸易的萌芽阶段，中央王朝从海路与国外贸易，必须从徐闻、合浦、番禺、交趾、日南等港口起航；外国海船到达中国，必须首先在岭南驻足，这决定了岭南在海路对外贸易中占了重要的地理优势。

国家统一与政局安定，为秦汉岭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秦统一岭南后，以武力征服的手段第一次结束了酋长割据的分裂局面。后虽赵佗称帝与中央王朝对峙，但岭南基本上统一在赵氏政权之下，处于稳定的局面之中，以后南越国归汉，虽有吕嘉反叛汉室的骚动，但很快被武帝平息。

这种统一局面便利于改造岭南落后的生产力使之逐步纳入封建王朝的规范中；岭南远离中原，与内地有南岭的阻隔，这种地理环境使它长期以来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之中。秦汉期间，中原地区出现过三次大的动乱，均未波及

岭南。这种安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民族融合是岭南经济发展的动力。秦汉时期是南方百越族人民与北方汉族人民大融合时期，秦时五路大军戍岭南是一次重要的人口迁徙。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①“三十四年（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②汉代向南徙民更多。元鼎五年（前112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统领“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南征，平定南越国后，不少将士也留守岭南。光武帝十八年（公元42年）四月，伏波将军马援平征侧、征贰叛乱时，除了部分的中原将士外还从长沙、零陵、苍梧、桂阳招集兵丁共20000多人，后有不少人留居交趾，“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返，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官语饮食，尚与华同”。③东汉末年，大批汉人为避战乱而南来，其中还有不少文人学者，成为传播文化知识的使者。如北海人刘熙“避地交州，往来苍梧、南海，授生徒数百人”。④精通五经的牟子和母亲避地交趾。桓晔在初平年间（190—193年）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使巷里不争讼。⑤

民族融合以及汉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体现在：

1. 百越族人民逐步放弃落后的生产耕作方式，学习和掌握汉族人民深耕细作的生产技术，

使不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后进民族，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

2. 改造了后进民族的风俗，使他们进一步汉化。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更多的少数民族人民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更多的物品被推销到少数民族地区，开拓了岭南市场。

3. 民族的融合逐步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成见，创造出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利于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刘邦曾称赞赵佗：“前时秦徙中县之民立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之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⑧

4. 汉族文化与越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例如：单牛牵引的水田耕作法在汉代岭南已出现，这正是汉越耕作法的有机结合探索出的新方法，它很适合南方小块水田的耕作。在建筑上，汉人的构架建筑与越人的干栏式建筑相结合，出现了风格多样，实用美观的汉代岭南建筑。在手工业的制品中，则生产了更多的饱融中原、南粤、楚风格的精美制品。

这一切都表明，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所产生的“杂交优势”必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和民族共同体的壮大与发展。

秦汉时期，中央封建政府在岭南推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也是此时岭南经济得以发展的一个原因。

首先，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地方经济不仅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与限制，而且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实行以越治越。秦统一岭南时“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仍任用百越之君。汉承秦法，不但任命粤人官吏，且将“越律”与“汉律”结合起来颁行。如汉文帝致书赵佗表示：“服岭以南，王自治之”。^⑦秦至西汉以来，政府都实行了“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⑥这种政策，充分发挥了越族人民的自治能力。《三国志·薛综传》论及汉治岭南时说：“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其实这正是汉代政策的妙处。

其次，秦汉政府积极扶持南疆开发，做了不少的工作，包括划分行政区域，建置郡县，对未开化的地区实行教化、徙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在开发岭南的过程中，政府委派到各郡的较开明的太守，努力传播封建文明，变革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象任延、卫飒、茂充、孟尝、周昕、贾琮、马援、唐羌等官吏，都积极贯彻汉政府发展生产，劝导农桑的治国策略和开明的民族

政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次，汉政府注意在岭南地区推行怀柔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任延任九真太守，教导维越族的人们行婚娶之礼。越人无礼聘，任延命长吏以下官员节省俸禄去赈助他们办礼聘。^⑨东汉和帝时省免了进贡荔枝、龙眼等岭南佳果，退回地方官吏上献的珍珠。“永元十三年（101年）二月……赈贷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八月诏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种粮，累赐下贫谷食”。^⑩马援南征交趾，所过之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⑪这类薄赋轻徭，扶贫济弱的经济政策，保障了岭南生产的顺利进行。

此外，建置沿海城镇，发展商业往来，开辟国际贸易的航道，是汉代在岭南采取的又一经济措施。它与当时在内地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这种贸易主要为皇室贵族搜求海外珍奇的奢侈品，但客观效果却促进了早期的国际贸易。汉政府发展岭南商业贸易的政策，促进了番禺、徐闻、合浦、龙编、西卷等港市的繁荣，对开辟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岭南商业贸易的传统，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

综上所述种种原因，使岭南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经济特征。

1. 持续上升的经济发展趋势

岭南在秦汉时期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秦统一到南越国时期，这是初兴的前期阶段；武帝以后的西汉时期，经济发展较快，是一个发展的高峰期；东汉是后期阶段，经济仍持续发展。从岭南人口数字的增长，可看到经济持续上升的迹象。秦末汉初，赵佗“众不过数十万”，^⑫西汉时总数达1,528,778人，^⑬到东汉时人数已达2,550,951人。^⑭人口增加说明了粮食产量和手工业品的增多，否则不可能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秦汉时期岭南正处于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尚未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步在形成之中，它解放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这一地区稳步发展的经济趋势。

2. 依附性与相对独立性并存

岭南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落后了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基础薄弱，只有依赖外力的支持和帮助去发展本土经济，因而呈现出对中原经济力量的依附性。每当中原的经济力量在岭南有所变化时，都影响到其发展速度的快慢。秦统一岭南，

除了分消裂力量，封建政权统治岭南，带来了南越国时期的经济初兴。汉武帝时代是汉朝的鼎盛时代，它促进了岭南经济的繁荣。岭南的早期开发主要取决于内地经济力量对这一地区的支持和渗透，岭南的政局依赖中央政府的军队去维持，岭南的生产技术有赖从北方引进输入，岭南短缺的铁器、耕畜、物资也依赖内地的补足。这种经济的依附性，加强了岭南与中原的相互联系，也便于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和控制。

然而，岭南作为百越文化的中心，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百越族群独自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兼之长期以来，中央王朝对岭南实行自治政策，结果是其经济发展有依附中原的一面，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一面。封建王朝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这里没有得到贯彻。当武帝下“告缗令”，中原地区中产以上的商贾遭到破产时，岭南的商人仍在致富。当王莽的经济政策把内地经济搞得一团糟时，岭南却安然无恙。东汉末年中原经济面临崩溃，而岭南却成了中原人避难的乐土。两汉时中原的豪族地主力量膨胀，乌壁经济控制了整个社会，但岭南的小农经济刚开始萌发，它缺乏豪族经济的温床，因而岭南与中原有较大的差异，呈现出自身的特色。这种经济的相对独立性正是南越国割据政权一度出现的经济基础。

总的来说，当中央王朝的力量强大，岭南经济的依附性必然增强，当中原王朝衰弱的时候，岭南经济的独立性则变得更为显著。

3. 商业贸易的优先发展

岭南南濒南海，地处水路交通的要津之地，海洋经济的特点助长了商业发展的优势。番禺是中国最古老、最大的海港城市，向为海内外贸易最集中，最大宗的集散地。番禺又是岭南的中心城市，地处珠江水系汇流出海处，对岭南腹地的各沿江城镇有重要影响，故商业贸易同农业、手工业相比，优先发展起来，并带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如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珍珠采集业、手工业中的造船业等都是为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而兴旺发展。汉朝海上丝路的经济贸易，成为仅次于陆上丝绸之路的第二条对外贸易的渠道。岭南的商业贸易以对内地的商业贸易作为补给本地短缺资源的途径，以对外贸易获取海外珍奇等奢侈品作为谋取暴利的手段。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岭南在全国的地位中变得日趋重要。

4. 多种经济成份的相互并存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岭南各地生产发

展的差异，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形态。在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家长奴役制中，仍是刀耕火种的劳作方式，如海南岛中的黎族、粤北山区的土著、桂西南一带未开化的西瓯族、九真、交趾部分偏远地区的雒越族等均属此类型。南海、苍梧、交趾、郁林、合浦等郡治，以及郡治附近的地区，还有交通要津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封建制的经济成份。其余部分地区则处于早期奴隶制的生产形态之中，仍保留着父系氏族公社的残余形态。在多种经济成份的相互并存之中，封建经济乃是主导的经济成份，它正以点带面地逐渐从郡治向农村推移。落后的经济形态在它的冲击下正渐趋瓦解。

当时的生产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封建性的官营生产机构，如汉代南越王在番禺设立的漆器、制陶、冶铸等作坊。主要集中在大的郡治，未能深入到广大的乡村。第二类是民营的生产部门，它主要由南下汉人所组建，如耒阳私聚的冶铸，沿海的煮盐业，各种的制陶、砖瓦业等。它分布的范围较广，有不少也深入到乡村。第三类是百越首领控制下的生产机构，在当时占有一定的比重。岭南广为流行的铜鼓，就是这些部族冶铸业的产物。部族酋长经济的存在，是岭南经济结构的地方特点。

岭南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体现了这一地区向封建制过度的时代特点，也体现了地区之间的悬殊差异，它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依然存在。

5. 早期的经济发展阶段

秦汉时期岭南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处于封建社会的早期的开发阶段。和本地区过去的生产水平相比，岭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和同时代中原地区的生产水平相比较，岭南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之中。被开发的地区相对有限，生产水平不高，这里仍然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由于岭南远离封建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有浓重的原始公社的残余形态，这决定了岭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在岭南的历史中，秦汉是岭南经济早期发展阶段，唐宋是初步繁荣的阶段，明清是鼎盛的阶段。也就是说，到唐宋后岭南才赶上中原地区的生产水平，在明清时期终于成为全国瞩目的重要经济区域。

秦汉政府经略岭南为后世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尤其对如何去改造和变革后进的民族地区，扭转其经济落后的状态，作出了初

(下转第71页)

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

陈伟明

唐代岭南内陆交通，若以广州为轴心，北可抵汴洛，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大理，东通闽浙，初具全方位的交通格局。至宋代，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之外，又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交通道的增辟；二是交通路线的整治与管理水平的提高。

宋代岭南交通道的增辟，主要集中在东西方向，即东通闽浙与西出大理的交通路线。

东路交通，向为落后，尤其是陆路交通。唐代有两路可通福建。若从广州始，可经循州（今广东惠州）至兴宁（今广东兴宁县北），若到漳州（今福建漳浦），则经程乡（今广东梅县）南行水路到潮州，东行沿所谓“漳浦路”抵达漳州。若到汀州（今福建长汀），也须经程乡北上而至。这种单线联系的交通状况，显然难以适应宋代岭南东部及福建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的需求。为此，宋代增辟了一条由惠州（即唐时循州）东南行经海丰至潮州的交通路线。绍兴二十九年，参政林安宅“蒙恩将漕东广，至潮间途趋番禺。”时人谓之“直北而西，由梅及循，谓之上路。南自潮阳，历惠之海丰，谓之下路。绵亘俱八百余里。上路重岗峻岭，峻险难登。林木蓊翳，瘴疠袭人，行者惮焉。下路坦夷，烟岚稀远，行人多喜由之。”^①此新道起码在南宋初已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建炎四年五月，“广西路左右两江嗣丁公事李域言措置收买战马赴行在，探报江西路各有贼马，道路阻节，今踏逐得广东有便路经自福建入两浙赴行在，欲起马纲自广东经路前去。”^②既称“便路”，乃指路线的通行条件，通行距离及通过能力皆胜它路而言，以东路上下两线比较，当指由惠州沿着近海狭长平原台地经海丰而至潮州的“下路”。宋末文天祥抗元，也是在此路途中被擒。“下路”的增辟及其通行条件较“上路”为优，使宋代潮州成为东通闽浙的中心枢纽。

其“虽为岭海小郡，而假道者无虚日。”“凡趋闽趋广者，靡不经焉。”^③

西路交通线，唐代主要是安南线与邕州线。安南线，实际上是唐人贾耽所记“安南通天竺道”，其中由安南（今越南河内）沿红河西北上溯转而南诏的路线。邕州线则是由邕州（今广西南宁）西出南诏的交通线。宋代由于安南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邕州线的交通地位日趋重要。其至大理国（即唐南诏，今云南大理）的交通线，以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阳县）为枢纽，也由唐代的一条干线发展为三条主线：

一是由横山寨经自杞国（今贵州兴义）的路线。具体是由横山寨始，经古天县，归乐州（今广西百色北）、唐兴州（今广西百色西）、睢殿州（今广西百色西）、七源州（今广西田林西北）、泗城州（今广西凌云县西南）、古那洞、龙安州（今广西乐业县西）、凤村山（今安州册亨县内）、上展（今贵州册亨县内）、博文岭、罗扶、磨巨（今贵州安龙县内）、自杞国、古（石）城郡（治今云南曲靖）、善阐府（治今云南昆明市）、至大理国，共20程。

二是由横山寨经特磨道（治今云南广南县）的路线。也由横山寨始，经上安县、安德州、罗博州、阳县（今广西百色县西）、隘岸（今云南富宁县东北）、那郎（今云南富宁县东北）、西宁州、富州（今云南富宁县）、罗拱县（今云南富宁县西北）、历水铺、特磨道、结也蛮（今云南广南县内）、大理国境、最宁府（治今云南文山县西）、大理国，共20程。

以上两道比较，“其道里固相若也”，然日程却有别。这可能与交通路线的路况与环境情况各异有关。另外“闻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寨，不涉二国。”^④惜无详述，唯志于此。

三是横山寨至罗殿国（今贵州普定、安顺一

带)的路线。“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经马乐县、思化县、罗夺州、围恭州、阿殊蛮、砾砂蛮、顺唐府、罗殿，共14程。由罗殿国也可转达大理国。“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迹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于罗殿而来。”

上述8路均以邕州横山寨为起点。其时还有一新道则是自宜州(今广西宜山县)经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县)而至自杞国或远至大理。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只是中央朝廷考虑到宜州靠近内地，恐生意外，才禁止马纲由此而入。但当时已十分畅通。乾道九年，南丹州刺史莫延蕃曾请置场南丹州以代横山买马议，其理由就是“诸蕃出马之处至本州一十程，道路平坦，水草丰足，兼无险阻。”^⑤

宋代岭南南北向交通道的增辟尽管在数量上较东西向线路逊色，但仍有相当程度的变化发展。如元丰元年北路开通了融州至荆湖北路的交通线。又邕州至交趾的线路，唐代只有由邕州经瀼州(今广西那堪一带)而至交趾的一条主线，即所谓“刘方故道”。^⑥而宋代邕州交趾一线大小规模不等，至少新增辟了三条交通路线。一是“自钦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二是“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模)榔县”，三是“又自太平寨东南行，过舟特罗江入其谅州”。说明了宋代岭南交通路线的增辟呈放射状发展。

此外，宋代岭南交通线普遍得到扩修整治，管理更为系统完善，大大改善了路线的通行条件与道路环境。

首先交通路线的扩修整治已纳入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内。绍兴二十九年，臣僚言“广西旧有灵渠，抵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余里，自潯江府经灵川，兴安两县。昔年并令两知县系衔兼管灵渠，遇堰塞以时疏导，秩满无阙，例减举员。兵兴以来，县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差注，亦不复系衔。渠日浅涸，不胜重载。乞今广西转运司措置修复，俾通漕运。仍俾两邑令系衔兼管，务要修治。”^⑦而且相邻地区不相统属的交通管理机构也要互相知照监督，共同担负维持跨区路线畅通的责任。嘉定六年，监察登闻鼓院张橐言，“潮州属广东，若取本路逆角，则自江西之广州而后达潮，其路为迂。故多由福建路转达，取其便速也。惟是福建路递铺官兵与潮州不相统属，故每每有沉匿之患。乞朝廷深酌以福建路漳

泉州巡辖递铺官至任满罢，令从潮州保明批书，广东路潮州巡辖递铺路到任满罢即从漳州保明批书。异时赴部住拟，得以点对逆角有无通滞以为升点，庶几，两路互有统摄。”^⑧以革两路地方交通管理机构互不相关影响驿路畅行之弊。

由于交通管理在地方行政机构的直接统辖下不断趋于系统完善。所以宋代岭南地方官员在交通整治管理方面颇有政绩。或建置驿铺，开宝四年，“知邕州范旻言本州至严州约三百五十里，是平稳径直道路，已令起置铺驿。其严州至桂州请修置铺驿，诏令严州桂州据管界道路，接续修持，各置铺驿。”^⑨或植树置舍，方便行旅。太宗年间，陈尧叟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又以地气蒸暑，为植树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饮器，人免喝死。”^⑩或伐山治道，以利通达，咸平年间，“广、英路自吉河趋板步二百里，当盛夏时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凌策“请由英州大源洞伐山开道，直抵曲江，人以为便。”其后不久，荣暹任广东转运使，“广有板步古河路绝险，林箐瘴毒，避开真阳峡至洗口古径，作栈道七十间抵清远，趋广州，遂为夷涂。”^⑪著名的大庾岭道，经由地方官员蔡挺兄弟主持重行整治，更是焕然一新。史载“庾岭险绝闻天下，蔡子直为广东宪，其弟子正为江宪，相与协议，以砖甃其道。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行者忘劳。……仰视青天如一线，既然而岭，即青松夹道，以达南雄州。”^⑫除了政府官员主持整修交通路线外，地方富豪乡绅也自发出资整修交通道，如潮州至漳州路段，昔“其路又多泥淖，间或筑砌，第景小石，才遇淫潦，行者涉者病焉。淳祐丙午陈侯圭捐金市石，依私僦工石两桥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余丈。憧憧往来，无复畏途病涉之患。”^⑬此举是岭南交通史前所未见也。

在道路保养方面，宋代岭南一些交通干线主要采取移民实道，兵民结合的办法，以优惠条件，鼓励民众配合地方交通行政机构进行养路护路。绍兴二十九年，潮州地区“凡居民去官道而远者，说令徙家驿傍，具膳饮以利行者。且自利官司，百役悉蠲之。”并“创盖铺驿，增培水窟，夹道植木，跨河为梁，诱劝乡民，移居边道，……于是铺兵与居民相为依倚，道傍列肆为酒食，以待行人，来者如归。”^⑭

宋代岭南交通路线的增辟与管理水平的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唐以来交通布局不平衡及大部分线路通行条件恶劣的落后状况。主要交通干线基本上畅行无阻。如“昭州路”，时人诗曰“我爱昭州路，优游不险崎，九嶷通舜野，八桂逐秦祠。”^⑩新辟的潮州“下路”，也是“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甫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路。”^⑪

唐代岭南交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东路不如西路发达。因为西路交通线有一条国际路线，即“安南通天竺道。”海外诸国外交朝贡不少由此而来，此其一；其二是西路所至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羁縻州府，唐朝政府为了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也大力整治西路，以确保军事行动的畅行。所以唐代岭南西部地区交通路线主要表现为两种功能，一是政治型，二是军事型，尤以后者最为明显。到了宋代，岭南交通的重要功能开始向经济型转变。其中以广南西路干线转变尤为明显。贞观十三年元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群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趾。”^⑫便已有案可稽，然当时尚未成为重要的交通干线。直至宋代，此道才逐渐成为岭西地区又一重要的交通干线。南宋时其中从罗殿至邕州路段更成为重要的马国道之一。买马虽出于军事目的，然当时岭南社会经济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故“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贡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贡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者什才一二耳。”这是宋代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所赋予交通路线以新的经济内容。沿着这条交通路线，商业经济贸易不只局限于邻近地区的交往，还出现了大宗长途贩运的记载。“富商自蜀贩绵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⑬其中之捷径必走邕渝线无疑。唐代所辟此线与其它干线一样，遂发展成为宋代岭南与四川或更多更远地区经济联系的要道。如“今桂产于钦，宪二州，于宪者，行商陆远，致之北方，于钦者，舶商远海，致之东方。”又邕州至交趾的陆路交通，唐代具体发展状况则少有记录。更多的是作为进军路线而散见于史籍中。宋时交趾已脱离中原王朝的统辖，然经济上的交往却更进一步发展。增辟了由太平寨与永平寨入交趾的陆路交通和从钦州入交趾的海路交通。除了偶尔的军事行动，岭南各族人民与交趾地区人民沿着这些交通线频繁地从事商业经济贸易往来。著名的“钦州博易场”与“永平寨博易场”就是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钦州博易场，就设置在城外江东驿。“其鬻鱼蚌来易斗米尺布者，谓之交趾蕃。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贡乃金银、铜线、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经济贸易形式分为官方贸易之大纲与民间贸易之小纲，两者互为补充，反映了商业经济之活跃，对当时交趾之国计民生影响甚大。“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邕州永平寨博易场，与交趾仅一涧之隔，“其北有交趾驿，其南有宣和亭，就为博易场，永平知寨，主管博易。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线及吾商易绛罗布而去，凡来永平者，皆嗣落交人，所贡必贵细，唯盐粗重。”这些著名的博易场均设置在交通驿亭附近，以取四通转输之地利，重和元年，“广西帅曾布请即钦、廉州各创驿，令交人就驿博买。”^⑭反映了宋代广南西路交通路线的社会功能已由军事型转化为经济型。故此，“边方珍异多聚邕矣。”那些富商更是“以下价索之（米），而舳舻衔于岸，运之番禺、以罔市利。”这正是随着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路线功能变化的又一具体表现。

此外诸如北路、东路、南路各主要交通干线也有类似的功能变化。如南路海南地区，唐代主要作为流放贬谪之地，交通闭塞。即使宋代，海南四州军，仍是“地方千里，路如连环，欲历其地，非一月不可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部环岛沿边地区首先得到开发，海上交通日趋发达。“（海南）四州之人，以徐闻为咽喉，南北之济者，以伏波为指南。”交通功能主要呈经济型。元丰年间，商品输入远可至泉福、两浙、湖广。商品有“金银物帛，直或至万余缗。”近可达高、化诸州，“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商品输出则以热带经济作物为大宗。如槟榔“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岁数万缗。”所以“海南四州军征商以为岁计”，海上交通成为海南岛经济的生命线。甚至地处南疆的吉阳军其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交通路线的经济功能显而易见。北路交通，宋代政治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南，更进一步增强了对南方乃至岭南地区经济的依赖性。反映在岭南北路交通的变化是交通重心逐渐由西移偏向东。商业交通往来主要以大庾岭路为中心。史称“汉唐

之西都也，由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之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淡水最便。”宋朝政府所需的大量金银，香货，犀象、百货等商品均由此陆运至虔州（今江西赣县），然后水运至京师。^⑩而湘衡一线也有不少商品由此而入岭北或输京师或贩运于湖南、湖北各地，如南岳一带“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人所须无不有。”然随着宋代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政治经济重心的确立，粤北此线的交通地位已难与大庾岭路相匹敌。而象贺州一路，更由于其经济地位低下，日益衰落。“此自中原南来者，久不行贺州岭路。”^⑪说明了北路交通的发达主要取决于其经济性质。东路也是如此，北宋时，周彦先“知循州兴宁县，至则相县南三十里宁昌驿以为治，能抚县人。”^⑫以驿站作为县治，是以交通路线的功能主要具有经济意义为前提。特别是宋代福建路地狭人稠，粮食多倚二广浙西米输入贍济，东路交通很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海陆兼至的“稻米之路。”甚至海外诸国商船、咸会风势不便，也先至潮州，然后再将其商品转输广州。^⑬

综上所述，宋代岭南交通路线承唐之基础进一步变化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质的方面。交通路线的功能之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无影响。

（上接第67页）

步的尝试和探索。事实表明，秦汉时期在岭南推行的政策是有效的，以后各朝也沿袭了这些政策和方法，并把这种历史经验进一步深化地贯彻推行，从而使岭南这块原是“南蛮”的后进地区，逐步地赶上和超过中原的生产水平。可以说，后代经营岭南的种种方法和措施，实质上是秦汉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 ①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
③ 《水经注·温水》卷86。
④ 区大任：《百粤先贤志》卷1。
⑤ 《后汉书·桓谭传》卷97。
⑥ 《汉书·高帝纪》卷1。
⑦ 《汉书·南粤传》卷65。

- ①③⑩⑭ 《永乐大典》卷5845《三阳志》。
②⑤ 《宋会要辑稿》兵24之32，兵23之10。
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以下凡未加注者，均见于此）。
⑥ 指隋仁寿三年，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平定交州俚帅李佛子叛乱的进军路线，详见《资治通鉴》卷179《隋纪三》。
⑦ 《宋史》卷97《河渠七》。
⑧⑨ 《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38，方域10之13。
⑩ 《宋史》卷284《陈尧叟传》。
⑪ 《宋史》卷333《柴漙传》。
⑫ 〔宋〕王巩《闻见近录》。
⑬ 〔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九梅挚《十爱亭》。
⑭ 〔清〕吕留良等选《宋诗钞初集》杨万里《南海集抄》。
⑮ 《资治通鉴》卷105。
⑯ 《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⑰ 《宋史》卷175《食货上三》。
⑱ 〔宋〕范成大《骞鸾录》。
⑲ 《嘉靖广东通志》卷47。
⑳ 《宋史》卷489。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 ⑧ 《史记·平准书》卷30。
⑨ 《后汉书·循吏传》卷76。
⑩ 《后汉书·和帝纪》卷4。
⑪ 《后汉书·马援传》卷24。
⑫ 《史记·陆贾列传》卷97。
⑬ 根据《汉书·地理志》人口数统计，包括粤北桂阳郡。
⑭ 据《后汉书·郡国志》人口数统计，交趾、郁林的人数从六郡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推算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谈政务的公开与监督

吴志亢 梁学忠

政务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了解政务，政务应该对人民公开，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政务公开不是孤立地单独地进行，它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生活开放程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政务公开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展。

监督是政务公开课题中应有之义。政务公开本身就意味着要接受监督。同时，政务公开的程度也影响和制约着监督，不公开很难监督；公开不充分，只能是有限的监督；没有监督作保障的公开，也就失去其意义。因此，对政务实行监督，是政务公开的目的，也是解决政务公开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政务公开中的监督区别于一般的监督，它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一是监督的公开性。一个政府是否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事，必须让人民公开监督。只有在公开监督之下，贪污贿赂、弄权勒索、失职渎职等腐败现象，才得以亮相和曝光。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量，使一些胆大妄为者不得不考虑监督的公开而有所

收敛，以身试法者则能及时得到惩处，使各种权力保护伞失去作用。二是监督的人民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监督政府是人民的民主权力。只有政务公开让人民监督，才能改变政府机关的封闭性和神秘性；才能使人民的民主权力得以保障；才能有效地防止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三是监督的追惩性。政务公开中的监督，既要贯彻思想教育以预防为主方针，但更主要的是对违反制度、纪律和法律者进行惩处。惩处也是教育，但更带有强制性和追惩性。没有追惩，监督就会流于形式，无法取信于民。

2 政务公开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的形成要解决若干问题。首先，监督要有明确的可衡量的标准，基本的标准就是法律。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起码要求是他们是否依法用权，依法行事，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制度、条例和规定。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府工作人员中党员成份很大，用党章和党纪来约束监督是必要的，而且党章和党纪与国家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可以统一的。但党章党纪毕竟是对党员的要求，而不是专门针对政府工作人员而制定的，它无法包括复

杂的政务活动中的许多特殊的情况。因此，不宜用党章党纪取代法律、政纪。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党员须受双重的约束监督，而且，首先是法律的约束和监督。由于政务活动涉及面很广，所以应将那些不具体、不明确、不好操作的制度、规定，改成具体的、明确的、可以操作的，便于执法人员执行，也便于对执法人员进行监督，“弹性”大了，不好监督；“硬性”的东西，“量化”的东西才便于检查对照。

其次，权力要相互制衡。对权力的制衡是形成和强化监督机制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我们一方面要调整权力结构，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以形成用权力约束权力的格局。另一方面，在明确分工的前提下，执法部门又要认真制订并切实履行各自的监督职责，各司其职，以形成对执行权的监督和对监督者的监督。监督本身首先应是一种权力，监督权也是一种制衡权。

第三，必须建立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构。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内部监督，这当然非常重要。但由于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内部监督效果有限。因为内部监督受视角限制，当局者迷；受感情心理上的局限，自我手术效应差；加之监督者在被监督者的管辖和控制下，打击报复事件屡见不鲜，尤其是对领导人的监督不够有力等，这些情况都说明需要在理顺关系、完善内部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外部的监督，并把内部与外部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外部监督机构的建立，须赋予他们足以制约执政人的权力。

3

当前，实行政务监督的重点应是党和国家机关保持

廉洁，反对腐败。为此，需要从四个方面强化监督机制：

一是加强对党员的监督。目前党员监督，一般号召和原则要求多，严格的具体措施少，可以说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善的监督机制。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党员干部的权限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和限制，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份外的享受和待遇，这是党内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强和改善党员监督，是形成和强化监督体系的关键。除了抓好纪委自身的改革和建设，使其具有充分的权威外，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加强党委自身的监督。一方面，党的各级领导班子都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重大问题都由集体讨论，绝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脱离集体处理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委全委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党章中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这些职权大多由它的常务委员会以至少数人行使，未能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改善和加强党员监督，需要认真研究全委会如何充分发挥领导和监督作用的问题，使其真正担负起议事、决策和监督的职责。二是完善党员群众的监督制度。党员群众能否有效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委，最根本的是要实行党务公开，明确党员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决定权，不这样做，就是侵犯了党员的权利，是违纪行为，所作的决定不能生效。

二是加强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政务公开监督体系的最高层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法律监督必须按严格程序，依法执行。实施监督

的方案，一要具体。就是监督程序的规定要具体到每一种监督方式。因为不同的监督方式有不同的程序，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不能采用相同的监督程序；二要有序。就是监督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监督的各个环节要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允许出现脱节和混乱现象，使监督者有章可循；三要独立。监督者依法行使监督权，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人的主观随意性的影响。实践告诉我们，法律监督的真正形成，既要靠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更要靠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增强法制观念，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只有切实加强法律监督，才能使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受到法律的真正保护。

三是加强群众监督。群众监督包括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监督，这是一支庞大的力量，对政务公开中监督体系的形成将会产生积极作用。群众监督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正常的民主渠道来开展，否则意见难以集中，力量难以形成。目前普遍设立的举报中心，是依靠群众揭露腐败现象的有效形式，也是人民监督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强化群众监督必须广开言路、废除以言治罪，给予人民以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

四是强化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公开性和评价性，这是监督功能的两个凭借力，也是政务公开赖以进行的十分重要的条件。舆论监督，又是实行法治的舆论基础。在诸种监督形式中，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也是最具现代化意义的监督形式。一些搞官僚主义或不正之风的人，“不怕内部批评警告，就怕广播见报”，便是生动的例证。强化舆论监督，关键是要保障新闻自由和独立。要增强舆论机构的自主权，记者对事实负责，报刊对法律负责。在新闻自由和诬陷反坐的法律保护下，扩大舆论监督的范围，提高其深度，发挥其作用。

监督机制的形成和强化，并不完全取决于监督建设本身，它还受到社会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除了使监督的诸要素健全以外，还应努力改善影响监督的政治环境，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这样，才能使健全的督监机制在政务公开的实际工作中正常地运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石 成

广东保险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侧记

本刊记者郑英隆、雷比璐报导：改革开放越向深化发展，风险也就越大。保证和推进改革开放，需要有保险业的发展相配套。如何确定保险业在经济发展新战略中的地位，以及探讨保险业参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循环，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新课题，这是最近在广州召开的“广东保险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与与会者的一个基本看法。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当前，保险业理论的一个基本状况是，保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已开始为社会所承认，50年代那种认为保险是“倒口袋”，可以取消的论调已听不到了。然而，对保险作用的评估，通常只看重经济补偿这一面，很少剖析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的深层配套作用。

与会者分析了保险的改革配套作用：（1）保险是新的所有制变动与股份化推行的配套工程。改革使我国所有制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存在全民、集体、外资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个体、联合体等多种经济成分，他们之间又互相融合，派生出多种多样的经济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筹资方式及其多元化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险来配套，这些合作将是一种不放心的或不巩固的合作，一旦遭遇风险，组合成的企业项目将毁于一旦，同时打乱部门或地区的经济综合平衡。（2）保险是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有的同志指出：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干部的招聘制与聘任制、劳动用工的合同制与临时工制的实施，使到“铁饭碗”解体，而同时使劳动者面临解雇或失业的威胁，这些激烈的变革，如没有相应的保险制度，势必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影响劳动制度的深化改革。（3）由于保险是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期限的风险概率确定费率的，一般来说，除了正常的赔付之外，能

积累一定的基金，可用于投资增殖，这是金融体制改革和搞活资金市场的深化。

代表们提出外向型经济发展不能忽视保险问题：第一，保险是完善引进外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外商的投资决策，首要考虑的是投资的安全性和能否获利。这就需要有风险保证，把宏观的不可控转化为微观的可控，保证投资经营的稳定。二，保险是组成国际贸易价格条件与出口创汇的因素。发达国家为支持和鼓励出口，普遍办理出口信贷保险，以解决诸如进口国买方不能按期付款、倒帐或政府更迭、外汇管制、突然的配额限制与外贸关税等政策变动的商业风险、收汇风险、汇率风险、运输风险、市场价格风险等等。此外劳务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及国外旅游的开拓，势必引起对人身意外保险、劳工保险、工程风险、投标履约风险等的保险需求。只有建立起适应国际市场风险大这种情况的各类海外保险制度，使外经贸企业的出口创汇经营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一旦出现大的损失能得以补偿，才有利于出口生产与外贸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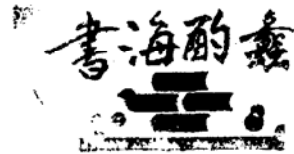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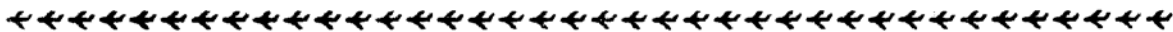
改革与开放的风险，需要有保险业的发展，而保险业的发展亦需要改革。有的同志提出，当前必须理顺四个关系：一是保险与财政的关系。目前，财政部门仍把保险业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把保费收入减除赔付与费用后，结余部分当作利润，并据此制定对保险业的政策和税率，这是一种限制保险业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实行省财厅代理地方财产保险业务的做法，同时，财政税率过高，保险公司难以积累起与保险责任相适应的保险基金，一旦不能有效地补偿，由财政“保底”，这种保险与财政同穿一条“连裆裤”的状况，不但不利于保险业的企业化经营，走自我发展的道路，而且会加重赤字条件

下的财政负担。二是保险与银行的关系。目前的情况是，保险准备金主要存入专业银行，保险很少能自己使用，也只能获得很低的一部分存款利息收入，这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自身积累与进取。在当前通胀和利率倒挂的情况下，还会由于保险存款不能解决保值问题，而导致大量储蓄性保险业务不稳定，也不利于保险公司进入资金市场。此外还有保险国内业务与涉外业务的关系，保险系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不理顺，保险业难以施展。

另一种看法是关键从体制上保证把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划分开来。他们认为，尽管两者都具有其社会性与共济性。但社会保险所具有的鲜明保障性与普遍返反性，是商业保险所没有的，而商业保险具有的金融性，又是社会保险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两者混为一体，把作为劳动制度改革

的社会保障与作为金融体制改革配套工程的商业保险相混同，非但不会有利于两者的促进，反而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两者的脱节，使保险失去真正的意义，不利于保险业的整体发展。因此，应区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把社会保险交由公共权力机构来经营管理。

还有的同志提出，发展保险业要：（1）采取与一般企业不同的资金运用和管理方式；（2）弄清保险业的内在结构，根据不同险类资金特点，运用不同的投资手段，使之不断增殖，保证保险基金不致于因物价上涨而大幅度贬值。（3）反对垄断，提倡竞争，鼓励民营，发展更多一些保险类别和保险公司。（4）完善保险业经营法规，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性质的法定保险制度。如退休养老、失业、工伤、医疗方面等。



“处处煮茶藤一枝”解

陈永正

黄庭坚《题落星寺岚漪轩》诗云：“落星开土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绝妙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此为山谷名作，选家所必录。潘伯鹰《黄庭坚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采录此诗，末二句注云：“各处房屋好象蜂巢，各开了窗子。而到处都用一枝枯藤烧火煮茶。”拙著《黄庭坚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黄庭坚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江西派诗选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均采录此诗，注解亦沿用潘说，谓末句意为“到处都用一根枯藤烧火煮茶”。其他宋诗选本，如钱仲联《宋诗三百首》及《宋诗鉴赏辞典》等选录此诗，皆如潘说。

按，“藤一枝”，应解作“一枝藤杖”。此“藤”，亦即山谷《题落星寺》诗之一末句“更借瘦藤寻上方”之“瘦藤”，为僧人所喜用的藤杖。唐李商隐《北青梦》诗“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亦写僧人闲倚着一枝藤杖。故山谷此诗“处处煮茶藤一枝”，当写从外边远望僧房的情景：在寺中的僧房各自敞开窗户，到处露出一根根藤杖，可知僧人正在拄杖煮茶。“藤一枝”三字，物中便有人在，僧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又，古人烹茶，主张用“活火”，活火，即“炭之有焰者”。故东坡有“活水仍须活火烹”之语。并认为“柴薪浓烟，最损茶味”（见《广群芳谱·茶谱四·烹茶》）。笔者草此文时，试烧枯藤，顿时浓烟滚滚，且用“一枝”枯藤，才着火便自熄灭，更煮不沸一锅水也。

全国首次张九龄学术研讨会在韶关召开

黄志辉、王毓非、李彩彬报导：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1989年3月14日至17日在张九龄的故乡——韶关市召开。会议前后，收到海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交的论文120篇。广东省和韶关市的党政领导和来自北京、内蒙、浙江、江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市、自治区的学者、专家及张九龄的后裔共17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在大会发言的有24人。会内会外，与会者本着批判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时代精神，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张九龄的历史功绩，从政治、历史、文学、思想、伦理等多学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张九龄的政治活动主要在开元年间，开元后期还入相三年，“开元之治”自然凝结着张九龄的一份不朽业绩。与会者认为，张九龄是我国历史上江南籍的第一名宰相。他忠君爱民，刚正不阿，道德、文章、才识兼备，是一位锐意革新、有特殊贡献的政治家。他主张农桑为重，要求“开井赋”，“广屯田”，并教河南数州种水稻；反对名器轻授，“去循资格”，“正官邪”，“防滥授”；他主持开凿梅关古道之后，不仅利于交通，利于邮驿，利于朝贡，利于贸易，而且利于文化声教，利于民族融合，利于团结统一，大大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岭南地区的开发。一些学者还指出，张九龄曾极力谏相李林甫，谏相张守珪，请诛安禄山，是唐代大治大乱历史里程上的一块界碑。尽管他终于贤才毁弃，政见不行，但这与其说是张九龄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国家的政治悲剧。这一点，早已在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中得到了确证。

关于张九龄在唐代诗坛的历史地位，古代诗评家有不少论述。与会者回顾了人们对张九龄诗的认识过程，从他诗歌的整体实绩出发，分析了他诗歌的主体形象和基本风格，总结了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有些学者比较了张九龄和陈子昂不同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创作题材、主体意识上的差异，分析唐代诗歌理论的沿革及其演变线索，指出张九龄诗具有过渡时期的特点，带有承上启下的性质，是从初唐进入盛唐的标志。他以当朝重臣和诗坛领袖的地位，继承风骚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力排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实践和光大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和创作影响，并引进、扶植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直接开创了清淡一派。因此，张九龄不仅是岭南诗人之祖，并且是初、盛唐诗歌革新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与会部分学者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肯定了张九龄的重大贡献。一些学者或以言为心声为线索，深入分析张九龄诗蕴含的隐衷，探寻他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或追溯张九龄诗风形成的思想根源，分析唐代崇儒重道的社会风气对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一些学者通过剖析张九龄神道观的内涵，说明这是传统儒学政治与宗教结合的一种形式，并兼容了佛教的涅槃学说和道家的养生之术，构成一套从心理、生理到人生哲学、自然哲学同构互补的理论，体现了“一变儒风”、“三教同归”的革新精神。

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对张九龄的一生业绩作出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但这只是开了一个好头；无论在宏观或微观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展开研究。

珠海市“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侧记

本刊记者林有能报导：

1989年4月13日至15日，珠海市召开“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会上的热门话题主要是唐绍仪晚节及死因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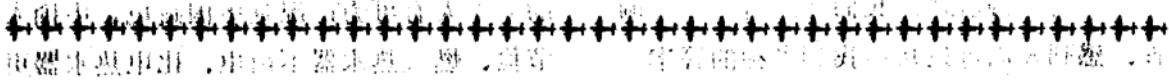
关于唐绍仪的晚节，以往的研究基本是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唐晚节不终，充当了汉奸；一是认为唐保持了晚节。这次会上，与会者运用大量的档案材料，结合严谨的逻辑分析，基本肯定了唐保持晚节，不是汉奸的观点。主要依据有：第一，唐绍仪自始至终拒绝了日方的拉拢劝降，因而没有充当汉奸的事实。从日本方面看，认定“唐氏在中国有数十年之声望经验，又有国际地位，一旦出山，必可影响国际，获得民众之拥护”而极尽拉拢之能事，先是推出“南唐北吴”政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继则在华中成立伪维新政府，要唐出山，最后则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唐密谈。在唐绍仪方面，他虽然有泛亚主义倾向而与日本方面有共同之处，也有与日人交往的事实，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未与日方合作，在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前，就对日本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有所警惕，拒绝出山，到后来还谢绝与日方一切来往，所谓唐与土肥原签订《和平救国宣言》并未公开发表过，也没有人能提供其中内

容和原件，仅凭某些回忆录是难以服人的。总之，唐未与日方达成过公开的协议。第二，军统特务虽以锄奸为名杀唐，但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唐充当汉奸的证据，所以，他们在杀唐后，只好建议“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第三，国民党政府从未说过唐是汉奸，反却在唐被刺后，蒋介石、孔祥熙等军政要人相继电唁唐氏遗族，抚慰有加，政府还明令褒扬唐氏，“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彰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第四，共产党人也未认为唐是汉奸。所以，说唐晚节不终，充当了汉奸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我们应肯定他保持了晚节，这才合乎情理和实际。

既然唐绍仪不是汉奸，为什么国民党军统特务以锄奸为名置他于死地呢？对此，与会者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难题，因为迄今还没有发现当局决定刺唐的内幕记载和军统刺唐从接受命令到制定计划的第一手材料；但学者们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作了合乎情理的分析。从客观上看，它是时局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日本方面早就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拉拢唐氏另立“新的中央政府”，随着武汉失守，国民政府退避西南，日方进一步加紧对唐的工作，拟采取绑架溥仪的故伎施之于唐的强硬手段迫唐就范；而唐系人物打着唐的旗号八方活动，炮制亲日拥唐倒蒋的方案；军统特务的情报则称唐已和日方约定在日方攻占武汉后出山建立政府。各种信息汇总到国民党政府那里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唐将“取蒋而代之。”这对素与唐有隙的蒋介石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为了消除隐患而终于下令诛唐。从主观

方面看，则与唐氏自身有关。首先，唐系人物及亲属打着唐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他不予以制止；其次，国民党政府出资要其离沪赴港，他以“年高多疾”为由在上海徘徊不去，动机令人怀疑；第三，面对时人的非难，要求他“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汉奸谣言”，他却自称一生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向不声辩，而以事实为之表现”而始终未公开表明态度和政见，使国人动摇了对他的信任，亦授当局以把柄。正是主客观的原因促成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李端《闺情》误解疏理

熊 飞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挑尽梦难成。
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喜鹊声。

李端此诗，妙在“不忿朝来喜鹊声”一句，可是近来注家，往往误解，遂令佳作失色。如张文勋释云：“她懊恼，她沮丧，连喜鹊的叫声也恼恨起来。”（见《唐诗鉴赏集》），又周锡馥（见《唐诗鉴赏辞典》）与张的解说也大同小异。他们都把“不忿朝来喜鹊声”一句中“不忿”一词解释为“懊恼”、“不满”、“沮丧”等意思。这个错误，或许由张相的解说引出，因为在《诗词曲语辞汇释》“分（二）”中云：“李端《闺情》：‘……不忿朝来喜鹊声’。意言门前伫望，不见夫归，埋怨鹊声之空报喜也。”这里，似乎把“不忿”理解为“埋怨”之意。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还是全面看看张相的解说吧。其“分（一）”云：“分，意料之词，读去声。……其习见者则为不分。”下列唐宋诗词中六例，总言：“凡上所举不分，均犹云不意或不料也。”在“分（二）”下云：“分，甘服之辞，读去声。……其习见者则为不忿。”除引数例诗词用例外，又引元明五剧中“不忿”，总云：“以上五剧之不忿，均不服义。”据此，“不分（忿）”具不意，不料，不服，不解等义，而并没有“埋怨”一义。可见，“不忿”实无埋怨、懊恼等意思。今不少方言中，仍保留有“不忿”一词，均为“不可理解”或“不服气”的意思。

由此体味，诗人其实采用了倒叙手法，先写女主人公彻夜不眠，拂晓出门守望，再点出这情绪的波瀾，实因昨日早起闻鹊而引发。在热切的盼望而终于失望之际，她迷惑不解而且心有不甘，“喜鹊向来是很灵验的，昨日早晨明明听见它叫噪得很，怎么会是一场欢喜一场空呵！”而细审张相所言，略同此意，所引出的误解，不应由他负责的。

神州人的科学精神

——顺德神州燃气具联合实业公司调查系列之一

梁 风

5年时间，一间小型农机厂变成扬名中外的外向型现代化高效益的大企业，神州燃气具联合实业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有什么“秘密武器”?我们几次来这里调查，感到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多种的答案。例如，神州人的拼搏与实干；神州人的机遇与精明；神州人的……我们从中当然也寻找到一个新的亮点，这就是神州人的科学精神，一种从中国农村镇办企业里闪耀出来的现代精神。

一、创业：不仅要立志拼搏，还要有科学精神，80年代的人，往往更需要后者——神州人如是说。

神州厂的腾飞，起点是开发、研制普通的燃气热水器。莫看这个普通的家用产品，四年前，它在中国大陆还是稀罕得很的东西，恐怕90%的同胞，并不知道它为何物。偏偏，一间濒于死火，仅有33名工人的乡镇农机厂，在绞尽脑汁寻找出路的时候，既偶然也必然地发现了它。厂长张鸿强，这个精明人从燃气热水器里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他们深感，我们企业并不缺搏劲精神，也不缺干劲，但是难以振兴腾飞，很大程度是缺乏一个适应时代和未来市场需要的产品。几经广泛、深入、细致

的调查、预测、争论，神州人以超前的眼力认定，莫看眼下烧煤气的人不多，但家庭煤气化是客观趋势，因此，燃气热水器的开发大有可为；况且中国缺电，中国人节俭，燃气热水器不用电，比电热水器更安全、更省钱、更方便。于是，张鸿强力排众议，作出了关键性的决策。

开发这一新项目，师傅国内没有，只能找日本人。日本人说：“我们当年研制了20年才做出燃气热水器，你们可以先搞组装，用日本牌子，逐步国产化，13年后大概可以独立生产整个产品。”神州人可不信这一套。“花13年贴外汇替日本人卖招牌?这不是‘搵笨’是什么!”张鸿强决心自己厂来干。他从香港买回一台日产燃气热水器，找来一班技工，进行解剖研究，经过先后九次的装、拆，终于摸清了日产货的来龙去脉，并结合中国自来水质，请有关专家加以改进。1985年，第一台国产燃气热水器研制成功，并通过了省级技术鉴定：全部技术指标符合部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规定要求，一氧化碳排放量低于部颁标准和日本同类产品的控制标准。他们把它命名为“神州JSYD—84型”。这是国内自己生产的第一台装有意外熄火自动防止煤气泄漏安全装置的水器，它既吸收了日本产品的长

处,又有中国自己的创新,而后又送到日本权威企业接受检测,大阪神菱株式会社的专家把它放大100倍,接连使用500小时,结果日本人信服了,打了一个90分。在日本,得80分的产品便可以生产销售。日本人惊叹道:“中国人用一年就赶上了我们20年的研制水平!”神州热水器的问世,使神州人从此以拼搏加科学而受到瞩目。

接着,神州人在科学技术上不断更新、创造。他们本着“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开拓一代”的方针,接连推出了一系列技术改进型热水器,从单一的排气式发展为平衡式1型和2型;从燃烧普通煤气到天然气和管道煤气产品,从旋扭式点火到脉冲打火强制排气式产品(JSYD5—B型、JSYZ5—B型)。形成了7个不同型号的热水器产品系列。神州厂从此扬眉吐气,成了“东南亚第一家”(日本专家评价)燃气热水器王国。

神州人把自己的拼搏和科学精神概括为一句话:必胜感、危机感、竞争感=神州。这种精神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1986年,神州ISYD—84型荣获广东省优质产品称号,并成为第一台获部优称号的热水器(农牧渔业部),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获部优的燃气热水器;1987年,神州ISYD—84型再获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被评为广东省最佳工业产品,被指定为“以产顶进、替代进口”,产品开办“在外售券,国内供货”业务,填补了国产燃气热水器出口空白,远销香港、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1988年,神州热水器被指定送往法国、泰国、加拿大等国参加国际博览会。叶选平省长为神州人欣然命笔:“神州在开放,神州在腾飞!”

二、管理:没有科学的思想方法,不可能建立和发展现代化新型企业——神州人如是说。

5年中,神州厂实现了高水平的“三级跳”:1985年试产阶段,年产热水器800多台;1986年批量生产阶段,年产量30000多台,1987年4.8万台;1988年全面腾飞阶段,年产量近8万台。他们乐观地预计第4个台阶——1989年年产60万台,成为全国最大的石油气具生产集团。

从产值和效益看,1986年产值300多万元;1987年产值达1280万元,实现利润97万元;1988年产值6000多万元,实现利润800多万元,人年均生产率17.6万元,出口4万台,为国家创汇198万美元。一个450名职工的镇办企业,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同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分不开的。神州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科学经营管理思想方法,贯穿于该厂的决策、生产、销售全过程。

(一)果断与科学分析论证结合的科学决策系统。正如上文所述,当年在开发燃气热水器时,就充分体现了这点。在我国南方家庭煤气供应严重短缺,北方家庭普遍没有澡房,且群众习惯了以柴煤为主燃料的情况下,敢于作出开发这项产品的决策,正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消费的变革前景作了大量的周密、细致的科学调查、预测的结果。近年来,为了加速技术更新,深入开掘高质优化的新型产品,神州人又对国际市场进行调查,瞄准国际最先进技术水平线冲刺,引进了上百万美元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每一项决策无

不具有一定的风险度，但神州人认为，没有风险就没有大的效益，渡过风险，赢得成功，关键在于科学的预测和慎密的决策。

（二）选择现代化经营方式，开辟现代化经营路子。神州人深知传统的企业经营的弊端，他们认为，作为一个450人的企业，搞“小而全”无疑是自我束缚。而开展广泛的社会横向协作和联系，借鸡生蛋、借风扬帆，则是扬长避短的捷径。因此，他们选择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模式，广泛吸引合作伙伴，部分零部件生产和技术，均通过外单位协作完成。在内部管理上，则实行以质量为中心的效益与工资挂钩的全面标准化管理流程。神州人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没有高质量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特别是使用煤气的家用热水器，其质量直接关系用户人身安全，人命关天。因此，他们把质量安全的管理和安全技术的攻关，作为生产的中心环节。他们不仅以高昂代价建立了质量检测中心系统，而且，制订了从原材料进厂——生产——检验——出厂——售后跟踪检查维修——外部保险等一条龙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5年来，已售出的30多万台热水器，使用中无发生一例故事，经跟踪检测，使用过程中关键零部件损坏率仅万分之零点三不到。神州牌热水器正是以其质量和安全可靠的优势，创出了名牌，赢得了声誉。

（三）周到完善的销售服务网络。热水器是一种直接生活消费品，销售服务的完善尤为重要。神州人认为，“用户是上帝”，这一名言是现代经营的科学精神，而真正做到用户至上，前提是产品本

身对用户需求的适应性；关键则是销售服务的周到。5年来，神州厂在全国先后设立了39个销售和维修点，有售便有维修服务，最近决定拿出50万元作经费进行一次加油保养服务，切切实实“服务到每个用户家里”。张鸿强有句朴实的话——“让自己的产品永远令用户满意”，这也是神州厂的信条。为了建立起用户对神州牌产品的信赖感，他们在同类产品中首先实行永久保修业务，收到了很明显的效果；他们同广州煤气公司、同各级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为用户开办安全保险，他们还大力宣传科学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方法，使用户处处感到方便。商业部门为此惊叹：神州厂在同类产品的销售方面，又赢得了一枚金牌！

神州厂的成功经验中蕴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和人的素质的竞争，而科学精神正是企业和人的素质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当今的企业界中，许多人都在谈论企业文化，神州厂也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笔者这里不拟专门对神州厂的企业文化作深入的探讨，但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科学精神是构成神州厂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并且，是它的灵魂。试想，从一个濒临死火的小厂发展到庞大的热水器王国，一大批“洗脚上田”的农民，成了向世界挑战的骄子，这里头意味着多少深刻的历史内涵。中国城乡的广大群众一旦摆脱了传统的精神枷锁，树立了科学的意识和精神，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神州人的成功，便是最有力的证明。“神州”，不愧是中国乡镇企业的一颗明珠。

责任编辑：石成

广东东莞市石龙制药厂部分产品介绍

(产品照片刊于彩色插页第1页,所列产品业经“粤卫药宣”批准)

舒肝益脾冲剂(粤卫药宣字198803第0089号)

本药运用中医治疗肝病的原则,吸纳现代药物研究成果,以茵陈、蒲公英、北五味子、黄芪、山楂、云苓和麦芽糖等组方,加工提煉制成。经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等六个医疗单位临床验证,表明本药治疗急、慢性肝炎病人总有效率分别为92.7%和85.1%。服药10—30天后病症得到明显好转,尤其是退黄和降低转氨酶方面效果显著。广州医药工业研究所药理实验结果“提示本药对肝胆损伤疾患应有良好疗效。临床使用安全。”

药用醛基淀粉(氧化淀粉)(粤卫药宣字198710第0059号)

慢性肾功能衰竭,氮质血症为一切肾病的最后阶段,目前医疗上尚缺适合的措施。而药用醛基淀粉是广州医学院提供工艺并经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多年临床验证,总有效率为98.8%,该药批量生产后,医疗单位及个人纷纷选用。

众生丸(粤卫药宣字1986第225号)

众生丸以古代名方普济消毒饮和仙方活命饮为基础,结合最新临床经验与科学试验研制成,可内服外用,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作用。广东省中医院临床验证,对细菌性感染疾病,如疮毒(包括多发性脓肿)、急慢性咽喉炎、扁桃腺炎等有显著疗效,总有效率达92.6%。且无不良反应。

痔快好栓(粤卫药宣字1986第226号)

临床表明,此药止血消炎快,术后愈合好。而且造型美观,易于携带,使用方便。

荣获一九八五年国家儿童生活用品委员会四新产品金鹿奖的

小儿退热栓(粤卫药准字(84)第E5—063)

解热镇痛疗效显著,适用于四时感冒、发热、头痛等症。直肠给药,可免除小儿不乐意吃药之烦恼。

皮炎平霜软膏(粤卫药宣字1986第227号)

广州市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科研成果,消炎止痒,对过敏性、虫类性、药物性皮炎有特效。

清热祛湿冲剂 (粤卫药宣字1986第230号)

该药选用黄芪、党参、茵陈、野菊花等药材制成,为中成药冲服剂。不但对湿热型的胃纳欠佳、消化不良、腹泻等有良好的疗效,而且具有抗疲劳、增强体力、增进食欲的功效。省育才幼儿园一院给儿童连续服用4周后证明此药“作为儿童夏季的保健饮料,能起到改善食欲,睡眠作用,对预防感冒同样有一定效果。”

滴通鼻炎水 (粤卫药宣字84第173号)

适用于伤风头痛鼻塞及一切急、慢性鼻炎。

食得乐消化水 (粤卫药准字85第E5—086号)

本品为最新健胃消化良药、营养丰富,药性平和,适用于小儿乳积不化,消化不良,肠胃不适及产妇乳房胀痛等。

欢迎订阅《春秋》杂志

《春秋》创刊于1982年,属综合性双月刊,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地方性特点。其文章多为社会各界名流亲历、亲见、亲闻,具有阅读、欣赏、研究和保藏价值。主要栏目:往事漫忆、人物春秋、人物小传、友好往来、名人轶事、当代企业家、港台往来、明星生涯、华夏纵览、社会录相、黑网沉浮、长江风物、文苑荟萃等。古今并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宗教、乡土风情等领域,共64页,约10万字。所载文章国内报刊常有转载,深受广大读者的好评。

《春秋》统一刊号为CN——1066,邮发代号88—81,定价1.20元,全国公开发行,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亦可汇款至本社办理订阅手续。本刊欢迎刊登广告,本刊广告经营许可证号:武工商广字71号。

地址:武汉市三眼桥一村附160号

电话:511852—4转701

联系人:黄启湘、王子江

东莞市莞城电子公司产品

地址：向阳路 2 号五楼

电话：22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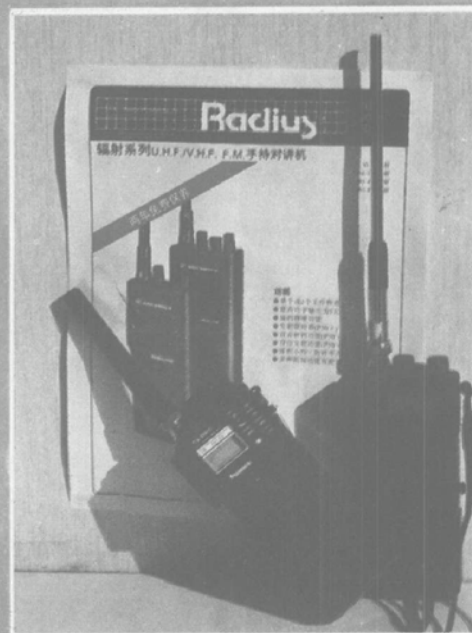
东鹏牌 DP2801 立体声电唱盘
被评为 1988 年优秀新产品

电话：224532



快达无线通讯部经销国内外各种无线对讲机等通讯器材。是美国“摩托罗拉”“先例”新西兰“大吉”的无线通讯器材的国内分销联络处。

电话：227756



利士集团主要产品有：

电话保密连接器、电冰箱保护器、电视调压器、健身磅

科源公司产品有：英汉微电脑、各类型电脑机板。电话：226415

电话：223635

利兴行产品有：各类型高级家具铰链、磁吸铰。电话：223932

东莞市糖果食品厂

该厂是东莞市最大的食品厂，有30多年历史。在1980年首家引进先进的即食面生产，所生产的海马牌“上汤鸡伊面”，以其独特工艺配方，其味鲜、清，畅销全国24个省、市，并在香港占有一定市场。



电话：224464 227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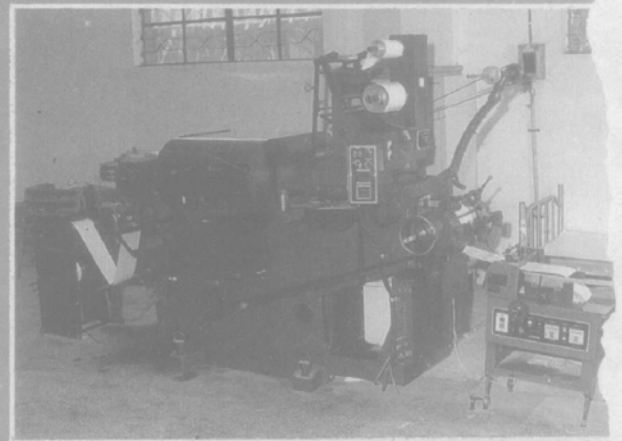
电挂：3929

厂址：东莞市莞城星耀坊5号

广东省东莞市东宏纸品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粤印刷厂

热诚服务 欢迎惠顾



业务范围

平凸彩印，无炭复写纸印刷，平印制版照相排字，不干胶商标，包装装潢，票据簿册纸类制品，彩印瓦坑纸盒、纸箱，各类规格口纸箱、内销纸箱及纸板。

东宏纸品实业有限公司
南粤印刷厂

电话：227216 图文传真：227215

电话：224249 224263

厂址：东莞市莞城镇旗峰路